



西藏通訊

總第96期

西藏通訊二零一三年七月至八月號

བོད་གནས་གསར་འཕྲིན།

TIBET BULLETIN 2013



達賴喇嘛尊者78華誕慶典活動在印南藏人定居點舉行

བོད་ཀྱི་ལོ་ ༡༩༩༠ རབ་བྱུང་རི་ལྔ་ཤོ་བཞི་ན་ལྔ་བ། ང་རམ་ས་ལ།

<<西藏通訊>>雙月刊

二零一三年七、八月號(總第96期)目錄

說明:所有署名及轉載文章,不一定代表本刊的立場

- | | | | |
|----|-------------------------------|----|---|
| 1 | 主編的話--- | 16 | 拉薩網格化 ---北京專家設下天羅地網、銅牆鐵壁 |
| 2 | 藏人行政中央就達賴喇嘛尊者78華誕而發布的文告 | 17 | 長在圖博花園裡的異種玫瑰：達瓦諾布
..... 潘美玲 |
| 3 | 司政：內閣將繼續努力重啟藏中對話 | 18 | 雜多縣藏民抗議採礦被軍警鎮壓 |
| 4 | 尊者78歲華誕日西藏人民議會祝辭 | 19 | 自焚女子貢確旺姆丈夫被判死刑 |
| 5 | 達賴喇嘛生日 藏區靜悄悄 | 19 | 道孚受槍傷藏人增至十五人 |
| 6 | 西藏問題對中國政府是巨大的道義挑戰
..... 瑞迪 | 20 | 《西藏是否具有民族自決權》（摘要）
..... 夏博義 |
| 8 | 日本作家出書描述藏人自焚背後的原因 | 22 | 我參加落實民族政策的經歷（全文）
..... 尹曙生 |
| 9 | 印南舉行達賴喇嘛尊者78歲華誕慶祝活動 | 25 | 中共對藏政策動向
..... 桑傑嘉 |
| 10 | 慶祝達賴喇嘛生日遭槍擊的詭異
..... 陳維健 | 26 | 西藏流亡政府發表聲明反駁俞正聲
..... 朱瑞整理 |
| 10 | 世界最高民用機場，經濟利益幾乎都流出西藏 | 26 | 西藏色達縣多名藏人遭判 |
| 11 | 從藏人自焚，透視中南海智力缺陷
..... 陳破空 | 27 | 《翻身亂世：流亡藏人訪談錄》之：安多果洛藏人 卓洛（二）
..... 唐丹鴻 |
| 11 | 簡訊 | | |
| 12 | 唯色評說西藏（四則） | | |
| 15 | 藏人行政中央中文網站遭駭客襲擊 | | |

<<西藏通訊>>存放在中文網站西藏之頁 www.hhdl.org www.xizang-zhiye.org

發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

主編:桑杰嘉

助編:次仁娜姆、麥賴、貢保措、益西丹增

地址: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Gangchen Kyishong, Dharamsala-176215 H.P., INDIA

電話:+91-1892-222510/222457

傳真:+91-1892-224957

E-mail:chinadesk@tibet.net

主編的話

由於中共加大對藏人的監控與鎮壓力度，自焚抗議事件不斷發生。指控眾多無辜藏人並進行非法逮捕、判刑等，使藏人處在更加惡劣的生活環境中。從而導致西藏境內局勢一直非常嚴峻，特別是最近西藏發生的幾起事件顯示中共對藏政策的整體情況。

7月6日，世界各地流亡藏人在慶祝達賴喇嘛尊者78華誕之際，西藏康區道孚縣的尼措寺（中文又寫：靈雀寺）僧眾及當地藏人聚集舉行煥桑祈福會為達賴喇嘛七十八壽辰進行慶祝，遭到中共軍警的開槍鎮壓。造成32人，中槍、被拘押期間遭毒打致傷。

7月15日，海南州政協副主席、州佛教協會會長嘉薩倉·洛賽尖措表示：“——由於對全省藏區維穩工作座談會和全省藏區和諧穩定宣傳教育工作會議精神領會的不夠全面，尤其在對達賴集團的政策方面，講解的不夠全面準確，誤導了社會輿論，造成了負面影響——”

8月13日起，由於數百名開礦工人抵達西藏康區玉樹雜多縣的三個鄉：阿多鄉、紮青鄉、薩呼騰鎮（原名結紮鄉，是縣府駐地），欲大規模開礦，三千多藏人在被劃為礦區的神山周圍靜坐抗議。8月16日，60輛軍用卡車抵達雜多縣，上千名軍警包圍抗議藏人，用催淚彈和高壓電棍對付靜坐民眾，並砸毀民眾的汽車和摩托車。有多名藏人致傷被送往醫院，多人被捕，阿多鄉27歲牧民索布阿珠當場用刀捅腹表示決絕抗議。

中共非法佔領西藏六十多年來，首次公開向慶祝達賴喇嘛尊者壽辰的民眾開槍，造成多人重傷。

徹底否定了之前各媒體紛紛報導的中共宣佈西藏寺院和藏人可以自由供養達賴喇嘛法相等說法，而且，“黃南州大力開展文化市場整治行動”

“……集中檢查清理公共場所懸掛、出售達賴畫像

及傳播謠言等”。

由於中共官商勾結，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中共對西藏生態環境不進行評估以及不理睬西藏人民的意願，任意鎮壓藏人自發保護西藏環境的野蠻行為，不僅加劇了西藏人對中國政府的不滿，且也違反了中國自己的法律。

以上事件清楚地表明中共對西藏仍然是“一貫而明確的”強硬政策。

特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和拉薩言論更體現了中共無意面對西藏現實問題。俞想盡辦法歪曲事實稱：“十四世達賴喇嘛所主張的“大藏區”“高度自治”完全違反了中國憲法和法律，也違背了藏傳佛教的根本利益。藏傳佛教界要認清達賴集團分裂本質，堅決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和西藏的和諧穩定。”等等言詞進行推卸責任和逃避。

但是，中共遲早要面對西藏的現實，最終要解決西藏問題。讓西藏三區的全體藏人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讓達賴喇嘛尊者返回西藏——這是六百萬藏人的意願。所以，中共要尊重藏人的意願。只有在尊重、平等的前提下才能“和諧”與共存。

當然，面對中國非法入侵並佔領西藏的歷史事實與中共殖民化統治的現實，解決西藏問題確實非常困難，但是，並非沒有解決的方法。

由達賴喇嘛尊者提出，西藏人民議會通過，藏人行政中央堅持實施的西藏人放棄恢復獨立，中國政府給予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之“中間道路”原則可以徹底解決藏中問題。能否以“中間道路”原則為立足點解決西藏問題是對中國領導人的政治智慧與道義的巨大挑戰，更是考驗中國政府是否有誠意解決西藏問題以及能否抓住這一絕佳機遇的時刻。

藏人行政中央就達賴喇嘛尊者 78華誕而發布的文告

在西藏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78華誕的歡快時刻，我代表噶廈和西藏境內外的所有藏人，懷著最深的敬意鞠躬並獻上我們的尊重。噶廈的所有閣員和所有的藏人與全球各地千萬的傾慕者一道在此祝願尊者身體健康、長壽！我們獻上我們的祝願，並重續我們毫不動搖的跟隨和忠誠，給尊者達賴喇嘛一吉尊降白阿旺洛桑益喜丹增嘉措司松旺覺聰巴密白德巴桑布。我們向尊者的慈愛父母表達我們最深的感激，因為他們，丹增嘉措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出生在西藏安多地區當采莊的一個農牧民家庭。他們的貴子讓我們得福！

尊者達賴喇嘛把自己視為一個簡樸的佛家僧人。對藏人來說，他是觀世音菩薩化身。尊者的偉大超越了西藏，為了有更美好的人類未來，他極力推動三項承諾：第一，擴展人類幸福的基本價值，或世俗化的倫理觀；第二，宗教間的和諧；第三，保存西藏和平和非暴力的佛教文化。

尊者達賴喇嘛倡導人類並無差異，都嚮往幸福和規避苦難。猶如生理衛生是健康的身體所必需的，基於善良心和慈悲心的道德衛生也同樣重要。他堅信，教育應該給兒童傳授認知和情感的智慧，以便培養健康的身體和健康的心智形成良性互動和平衡。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藏人行政中央將在藏人學校設立有關世俗化道德倫理學的課程。

作為宗教間和諧的不懈倡導人，尊者達賴喇嘛與不同教派的宗教領袖互動，參訪了無數的廟宇、清真寺、教堂、和寺院。尊者達賴喇嘛還發揮了重要作用來保存佛法，並把它們從佛法的保留地西藏再帶回發源地印度，同時向全球六大洲、67個國家傳播。在被佔領的西藏佛教寺院和文化機構遭到破壞，但卻在流亡中得到復興和重建。尊者還鼓勵藏學專家和行者把那爛陀佛教傳統貫穿入宗教、哲學和科學的不同領域裡。

尊者達賴喇嘛也是一個促進世界頂級科學家和佛教僧人展開廣泛對話的先驅者，他極大地推進和豐富了現代科學和佛學兩個領域。佛教修行者對心性的探索也運用到了當代科學領域，並在世界知名大學裡建立了合作項目，例如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艾莫利、威斯康辛、蘇黎世、德里等大學。

尊者達賴喇嘛是當今世界上最受尊敬和愛戴的人物之一。就像聖雄甘地、納爾遜·曼德拉和特蕾莎修女，尊

者對改進更多人類的處境所做的貢獻遠遠超越了他的宗教和時代。他的持久貢獻從他被授予的150多項榮譽、獎勵和名譽博士學位中得到印證。其中最為著名的有198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1991年的聯合國地球獎，2007年美國國會金質獎和2012年鄧普頓獎。鄧普頓獎的授獎詞肯定了尊者推動對慈悲的力量以及它對世界諸多根本問題可能提供解決方案進行科學調查和研究。

隨著尊者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日益隆盛，全球對西藏的瞭解和支持也與日俱增。尊者作為世界上最有感召力的人物之一，直接和正面地塑造了西藏人的形象，從根本上促進了西藏事業。

從尊者達賴喇嘛那裡，藏人找到了一個無與倫比的領袖。在年僅五歲被認證為尊者達賴喇嘛，尊者在15歲時就被迫承擔起了各種政治責任，並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西藏的佔領，在24歲時又被迫流亡印度。隨著西藏整個文明的認同、希望和未來命運的大任都降落在他年輕的肩頭，尊者不得不放棄正常的童年生活。猶如一個好的牧者帶領他的牧群穿越乾旱地帶來到青草地，這位年輕的領袖獨自擔當，避免了他的人民和西藏議題被歷史遺忘。尊者是把西藏三區（衛藏、康區和安多）、藏傳佛教四個傳統和苯教統合為一個精神的力量。儘管西藏境內絕大多數人從未見過他，他也是境內藏人的一盞希望明燈。我們西藏境內的同胞，包括新生代，都表現出了深深的忠誠，並明確地期望能與尊者團聚。

迄今為止，在西藏已有119名藏人自焚。他們的冤屈反映在因譜寫歌曲而被監禁的白馬赤列和恰多兩位年輕歌手以及他們譜寫的歌曲裡：

**尊者從西藏流亡異鄉，
沒有了你，藏人就像是孤兒，
在漢人的統治下，
苦難變得難以承受。**

我們在西藏的同胞，包括自焚者，明白無誤地表明他們的初衷是要尊者達賴喇嘛回歸西藏以及藏人獲得自由。流亡中和散居世界各地的藏人，尤其是新一代，必須認識到這一追求，並把它作為一個神聖的職責。這是我們對境內的藏人最低的虧欠。它號召我們全面地去領悟尊者的領導力、思想觀點和為西藏和藏人描繪的願

景。

流亡中產生的西藏民主從它的初創到今天的鞏固狀態，都要歸功於尊者達賴喇嘛數十載的工作和努力。在當下我們奮鬥的緊要關頭，流亡中和散居世界各地的藏人必須負責任地運用民主和自由，顯示他們與西藏境內藏人的團結，同時密切關注他們的苦難，挑戰中國政府的強硬路線，把所有藏人聯合起來。

早在1970年代，尊者達賴喇嘛就已經著手與各派西藏領袖協商、徵求西藏境內藏人的意見，來形成一項有遠見同時又務實的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新形成的路線在壓制和分裂兩個極端之間行走中道：它一方面絕對反對中國政府對藏人施行的壓迫性的殖民政策，同時並不尋求從中人民共和國分裂出去。這個雙贏建議後來成為世人所知的“中間路線”，試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架構下為藏人爭得名副其實的自治。這一方針與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立場也一致，他曾說過：“只要不獨立，什麼都可以談、都可以解決。”

“中間路線”為達蘭薩拉和北京之間建立聯繫提供了可能，為此，中國方面的代表和尊者達賴喇嘛的特使舉行了一系列的會晤。西藏境內外的藏人第一次獲得機會進行聯繫和互訪。成千的西藏學生和僧侶可以訪問印度，接受世俗和寺院的各種教育，為此促進了西藏境內佛教的正興和對藏人行政中央的瞭解。

中間路線得到了西藏境內許多知名藏人的支持，他們認為這是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現實方案。此外，這項政策也使得許多國家的政府能支持一個有可行性的西藏問題解決方案，同時幫助他們在與中國的雙邊關係中提出西藏議題。在2011年7月16日奧巴馬總統會晤尊者達賴喇嘛後，白宮稱讚了“達賴喇嘛奉行的非暴力、與中國對話的中間路線”，同時還“鼓勵直接對話來解決長期的分歧，富有成果的對話將對中國和藏人都有益處。”

“中間路線”正在產生效果，一個重要表現是在許多漢人，尤其是漢人知識分子中間。一些最出類拔萃的知識精英，包括現在仍被監禁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劉曉波，在2008年以極大的勇氣簽署了一封公開信，支持尊者達賴喇嘛的和平倡議。此後，漢人學者和作家發表了上千的文章和評論，其中包括北京的一個法律非政府組織“公盟”發布的一份報告，敘述了藏人的困難和冤屈，呼籲政府改變政策。藏傳佛教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來自大陸的漢人信徒。據估計，中國今天有三億多人信奉佛教。尊者達賴喇嘛主動接觸漢人學者和學生的努力以及他對漢人佛教徒的講法正在重塑漢人對西藏和藏人的態度。

在尊者達賴喇嘛78週年華誕的喜慶日子，藏人行政中央再次重申，在解決西藏問題上將繼續堅持奉行“中間路線”。自2011年8月噶廈組成以來，我們就已推 進了包含鞏固、行動和對話三階段的方法。

鞏固階段主要覆蓋了第一年，來確保尊者達賴喇嘛做出歷史性的放權決定後，政治權威能順利地移交給民選的領導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把全球各地的藏人代

表、印度和全球支持藏人的組織的領導人匯集在一起，在達蘭薩拉主辦了幾次重要的會議。

行動階段包括了在幾個城市舉行的團結一心活動，包括紐約、新德里、布魯塞爾、東京、悉尼等城市。這些團結一心活動還與提升媒體西藏意識和努力相配合，在全球的國會和議會中尋求對西藏的支持。與西藏之友和支持者協同工作，我們在歐盟、法國、義大利、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議會裡通過了一系列支持西藏的議案或決議。

三階段是相互關聯的，對話階段將繼續尋求努力、提出動議來恢復與中國政府的接觸。我們還做出了更多的努力和投入，來讓藏人和外界的各類人更多地瞭解中間路線。藏中和談工作小組將會擴大，它的成員將在2013年的九月舉行第26次會議，來討論近期中國和西藏事務的最新發展。藉此機會，我要感謝印度的偉大人民和印度政府對藏人提供的一貫幫助和支援。我也要感謝全世界的各國政府和我們的支持者們！

最後，我向尊者達賴喇嘛獻上我的祝願，祝他身體健康長壽！本著團結、創新和自立的根本原則，願尊者的希冀和西藏境內外的藏人的訴求能被成全！願尊者促進和推動建立一個更有慈悲心、更和平的世界的努力最終大功告成！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 2013年7月6日

司政： 內閣將繼續努力重啟藏中對話

【VOT8月8日報導】藏人行政中央在司政洛桑森格執政滿兩周年之際，司政洛桑森格重申以中間道路努力與中方進行對話。

8月8日，是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任職滿兩周年的日子，宗教與文化部於上午9點30分，在達蘭薩拉大乘經院中舉辦了大型祈禱法會。為所有在西藏抗爭中犧牲的同胞進行誦經祈禱，同時紀念洛桑森格任職滿兩周年。

在向聚集的藏人僧俗們發表演說時，司政洛桑森格指西藏境內的局勢持續緊張，中共政府的壓制政策依然存在，這些都直接導致了上百起自焚事件的發生，但是他再次強調不希望藏人採取這種慘烈的抗議方式。他說，（錄音）內閣噶廈的立場很明確，一直都在呼籲藏人們不要採取極端的抗議方式，今天再次向大家強調這一點。但是我們作為佛教信徒，為亡者超度祈福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作為藏人，我們團結一致，為實現自焚同胞們的訴求而繼續努力，也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他說，十四屆內閣噶廈已經舉行了三次藏中對話籌備小組的會議，下月初，將舉行第四次籌備小組會議，屆時將宣佈新成員名單。總之內閣噶廈會繼續秉持中間道路，朝著重啟藏中對話的方向做出努力。

尊者78歲華誕日 西藏人民議會祝辭

今天是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以人身化現於世的三界法王、世界和平使者、西藏人民至高無上的領袖和佑主、西藏的象徵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誕辰的殊勝日子。

尊者為著一切有情眾生，特別是為著他的教化之地雪域高原的眾生，於藏歷16繞迥木豬年5月5日，公元1935年7月6日在眾多祥瑞繽紛的徵兆中誕生於西藏安多塔爾寺附近之達采地方。在這吉祥圓滿的尊者華誕殊勝日，我們懷著赤誠敬仰的心情向尊者的生日表示深深地問候！同時，祈禱尊者為一切有情眾生，尤其為護佑領導吾等雪域眾生，為世界和平而永久駐世！祈願尊者依據世事情勢繼續為我們做出取捨教誨之甘露。

尊者為教化雪域有情眾生幻化為西藏的君王、大臣、菩提覺勇士等各種人身相而使西藏政教興盛、人民安居樂業；自第五世達賴喇嘛創立噶丹頗章政權擔任西藏政教最高領袖以來，三區統一的西藏政權得到了穩固；特別是十四世達賴喇嘛自16歲起就被迫親政，為改良西藏政體弊端；為使西藏民族不遭受中共惡魔迫害而巧妙周旋、鞠躬盡瘁；後被迫流亡印度後重新組合西藏流亡政府的政體結構，完善行政機構，並為使西藏流亡政府走上民主化道路，於公元1960年成立西藏人民議會；1963年頒布西藏憲法精要；1991年增加西藏人民議會議席，使之成為名符其實的立法機構，由它通過的流亡藏人憲章及其其它法律由尊者批准簽字生效；從2001年開始流亡政府總理由選民一人一票直選產生後居於半退休狀態；最後將所有政治與行政權力移交於民選產生的政治領袖等等，在過去六十多年的時間裡為西藏的自由及福祉付出了最大的艱辛！

尊者在將所有政治和行政權利移交以後，也如藏人所請求那樣同意以藏民族的佑主及象徵的名義，對西藏的政教事業等各方面作出指導；如需要，對有些重大的政治及宗教議題向藏人行政中央議會及行政噶廈也提出相關意見及建議；並同意為西藏和西藏人民經常與國際政要及重要人物接見，探討西藏問題等等，在此向我們最尊敬的領袖達賴喇嘛尊者表示最真心誠意的感謝！同時也祈願尊者繼續大悲攝持雪域高原的子孫們！

尊者不辭辛苦，為造福眾生而奔波於世界各地，以宇宙責任感向全世界傳播慈悲、寬容、非暴力為原則的和平理念；尊者不分貧富尊賤、有無宗教理念，以道德倫理

教育每個人，提高他們向善精神及環保意識；尊者為促進世界各宗教間的團結，經常以寬宏大量的心態與各宗教領袖討論各種疑難問題，彼此消除誤解、增進相互間的信任感！特別是尊者提倡佛教與科學間的對話，彼此取長補短，提升佛教能與科學同步前進等等，所有這些善舉不僅是全人類的福分，也是一件值得為此歡呼高興的大事！

按照尊者的意願，由藏人行政中央制定並繼續實行的藏中雙贏「中間道路」政策不僅獲得了世界各主要國家的領導及民眾的支持，也獲得了以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為主的很多人的支持和相應。因為這直接涉及到藏漢兩個民族短期及長期的根本利益，我們希望中國政府真正地負起責任，以務實的態度解決西藏問題！

今年三月九號，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先生在接見西藏自治區代表團成員時，像平常在強調中央維護西藏主權及穩定的決心，以及這一原則問題上不會向國際敵對勢力，達賴集團低頭的同時，習近平先生還強調：「一我們還應該充分認識西藏的特殊性，充分尊重藏民族的宗教信仰，保護西藏的語言文化和風俗習慣，認真落實民族區域政策。這兩者結合起來西藏才能長治久安」。又今年六月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靳薇女士在接受亞洲周刊採訪時「一我個人以為雙方坦誠、真實、建設性的對話是非常必要的。二零一零年，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與達賴喇嘛代表進行了第九次會談，雙方均認為無實質進展。但為涉藏工作計，我個人建議重啟會談。」「一西藏自治區的幾位書記在任時對宗教事務的一些做法失之偏頗，為今天的民怨累積埋下伏筆」等說法，我們認為有別於以前中共領導的強硬提法，從中也看到了中國政府有意改變現行強硬民族政策的初端。加之最近藏區很多地方出現的所謂「政策有所寬鬆」的民間新聞雖然有很多種解讀，但因為這涉及到藏漢兩個民族的直接利益，我們還是希望有這樣的變化出現！

最近（6月8日）西藏自治區在拉薩召開首屆歸僑僑眷代表大會，會上以陳全國為首的西藏自治區高級官員強調要加強與海外藏胞的聯繫，讓海外藏胞進一步了解新西藏，回歸新西藏。最近也有西藏自治區的高級官員初訪北美發表了相同的講話。我們認為這是為削弱流亡藏人的實力，進一步分化瓦解流亡藏人的又一圈套，希望

在各國的藏人不要被一時的經濟利益及美麗的謊言所蒙蔽。

最近在藏區很多地方，當地警察因一些微小的糾紛對藏人施暴導致死亡的事件時有發生，還在不斷發生著歧視凌辱藏人的事件。這些做法公然違背中國憲法及法律所規定民族平等及不得歧視凌辱其他少數民族的精神，我們希望中共當局更正及杜絕此類事件再次發生，真正落實憲法及法律所規定的民族平等政策。

我們強烈呼籲新的中國領導人改變以往僵硬的民族政策，釋放以班禪仁波切為主的，特別是自08年以來因參與和平抗議活動，以及在之後的自焚抗議活動中被牽涉而被捕入獄遭受苦難的所有西藏良心犯，在整個藏區創造出一個和諧的氣氛。

我們藏人流亡到以印度為主的各國已經54年多了，特別是印度不僅成為我們的第二故鄉，印度政府和民眾給予我們無限的關照和幫助，在此我們表示深深地感謝！我們也希望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遵從尊者達賴喇嘛的教誨，遵守所在國國家的法律，廣泛結交關係，為守護和保持藏人的尊嚴而努力！

最後衷心祈願尊者達賴喇嘛永久駐世！西藏問題能夠早日得到解決！

西藏人民議會 二零一三年七月六日

資料來源：藏人行政中央官網

達賴喇嘛生日 藏區靜悄悄

7月6號是達賴喇嘛的78歲生日。青海海南州共和縣的藏人默默在家慶祝。雖然近來有報導稱，中國當局似乎有意放鬆對西藏的控制，但藏人們依舊擔心任何公開的慶祝活動將帶來不利影響。

（德國之聲中文網）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曾被中國官方稱作“披著袈裟的狼”，每逢其生日，在中國的藏人被禁止舉行任何相關的公開慶祝活動。然而，今年在達賴喇嘛生日到來之前，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組織透露，中國青海的官員考慮取消懸掛這位西藏流亡精神領袖法相的禁令。

週六，青海卻沒有任何慶祝的跡象，不少普通藏人甚至不知道今天是達賴喇嘛的生日。在距青海省會西寧不遠的塔爾寺裏，僧人們正在向供奉達賴喇嘛法相的神龕祈禱。僧人凱度（Khedroob）告訴路透社記者說：“我們會自己在家慶祝他的生日，我們從來不會公開慶祝。”“我們不會等到特別的日子才慶祝，他值得我們每天慶祝。”

管制放鬆？

凱度補充說，他通過一條手機短信獲悉，青海政府就是

否允許藏人懸掛達賴喇嘛的法相展開了討論。但是他對此半信半疑。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組織上周聲稱，青海官員們也在考慮可能停止強迫藏人譴責達賴喇嘛的做法，並減少部署在寺院內的警力。這一消息讓人不禁猜測政府有意放鬆對中國西藏地區的宗教管制。

中共中央黨校的一名學者近來表示，中國應該著手重啟2010年擱淺的與達賴喇嘛代表的會談。這種觀點令觀察人士重燃希望：今年3月上任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似乎要對西藏採取新的政策。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報導則否定中國政府正在改變針對達賴喇嘛的政策。該事務局在回復路透社的一份傳真中寫道，達賴喇嘛必須放棄西藏獨立的立場。

在1959年一場對抗中國統治的起義失敗後，達賴喇嘛從西藏逃往印度，被中國政府視為極端分裂分子。達賴喇嘛表示，他僅僅是在為自己的故鄉追求更多的自治。種種可能發生政策改變的跡象表明中國共產黨希望緩和2008年西藏大規模騷亂被鎮壓後的緊張局勢。

務實路線

哥倫比亞大學的西藏問題專家巴尼特（Robbie Barnett）指出，如果中國在青海和四川解除民間崇拜達賴喇嘛的禁令，也就是重新恢復了08年之前的規定。巴尼特補充說，雖然還不清楚這些調整是否是北京的指令，但有些跡象顯示中國新領導層在處理西藏問題上愈加務實。他說：“胡錦濤當權時，務實派沒有直言並說服自己接受胡的強硬路線。現在他們改變態度並承認自己犯下的錯誤。”巴尼特繼續說：“但他們是否能夠戰勝內部的阻撓而進行改變以及改變能走多遠，都還是大問題。”

藏人卻不確定，事情是否真的有所改變。四川甘孜寺的一名僧人在接受路透社記者電話採訪時表示，他也收到了一條中文短信：藏人獲許懸掛達賴喇嘛法相。“我們仍然不敢這麼做”，他說，“因為我們還沒有收到官方通知，所以無法確定這條資訊是真是假。”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中國西藏關係教授史伯嶺（Elliot Sperling）稱，中國政府因為考慮到達賴喇嘛的繼承問題而正在走“實用”路線。

史伯嶺繼續說：“沒有任何跡象反映出中國政府有改變意向是因為現有政策有悖人權法規或有失公正。”許多藏人擔心，北京會直接指派代表替代達賴喇嘛，此舉必將在西藏造成暴力抗議活動。達賴喇嘛表明他可能會海外圓寂，轉世過程也可能打破傳統，可能會由他親自指派或通過民主選舉產生。

其實，是否允許藏人懸掛達賴喇嘛的法相並不重要，四川廣法寺的住持貝瑪仁千（Pema Rinchen）在電話裏告訴記者說：“因為我們在心裏崇拜他，這已足矣。”

來源：路透社 編譯：安靜

責編：雨涵

---德國之聲中文網

西藏問題對中國政府 是巨大的道義挑戰

作者 瑞迪

德吉曲央女士是總部設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噶倫。這位在西藏外出生，在美洲長大的女性何以離開舒適的生活環境以及開放的就業天地，前往印度達蘭薩拉加入流亡藏人政府？在父母的西藏記憶中長大，有著在北京和在西藏生活體驗的德吉曲央如何看待西藏的未來？歡迎您收聽本台對德吉曲央女士的電話採訪。

德吉曲央女士1966年出生於印度，四歲時隨父母移居加拿大生活，在那裏完成了學業，並開始工作。在北美洲的生活並沒有真正割斷她與西藏的聯繫，自少年起，她就開始利用語言優勢，為流亡藏人服務。90年代中期，她更是難得的獲得了去北京和西藏學習和工作的機會，父母傳輸的西藏記憶從此融合了個人的實地體驗。2011年，她先是投身藏人議會選舉，隨後又應邀進入藏人行政中央，擔任外交部長，在達蘭薩拉開始她原本不曾設想過的從政生涯。

對於藏人來說，文化認同和作為一個不同民族、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價值觀的權力非常重要。

法廣：您在印度出生，在加拿大長大，西藏對於您意味著什麼呢？

德吉曲央：我在印度出生，在加拿大長大。第一次見到西藏時，我已經27歲。我的父母在1959年中國軍隊侵入的時候，離開了那裏。所以，在27歲以前，我對西藏的瞭解僅限於父母的講述。

對於我來說，西藏是我的文化認同，是我的根，是我祖先的土地，所以，西藏不僅是一種事實存在，更是在情感上讓我十分牽掛的地方，我還有很多親戚在那裏生活。大部分親戚都在我家曾經生活的西藏東部。

法廣：您主要在西方接受了高等教育。為什麼放棄在加拿大舒適的生活環境，而要選擇去氣候炎熱、居住和生活條件都差的達蘭薩拉開始從政生涯？

德吉曲央：要知道，這實在是一種心靈的選擇。我剛才說了，西藏是我的文化認同，我非常熱愛藏文化，也相信藏文化遺產可以對世界做出的貢獻。對我來說，選擇來印度，進入藏人行政中央工作為了在尋找一條讓西藏走出目前狀況的路徑的努力中盡一份力量：目前藏文化生存的處境確實很危險，必須要找出辦法，走出這種狀況。在這裏，我負責外交和關於西藏事業的新聞。我想，我可以更好地利用我的專業所學以及在中國和西藏

生活過的經歷，不僅在國際舞臺上，也在藏人和中國人之間，來啟動、宣傳西藏事業，豐富西藏事業的表達，以便能找到一種折衷妥協，讓藏區既是中國的一部分，又能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讓藏人通過教育，通過宗教，通過文化，保存他們的文化認同。

西藏問題解決之時，藏人行政中央即可解散

法廣：兩年前的藏區選舉，流亡藏人投票率很高。以您個人的經歷來看，對於這些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來說，達蘭薩拉的藏人政府代表著什麼？

德吉曲央：我想，讓中國聽眾更好地瞭解我們的組織架構很重要。實際上，我們認為我們是藏人行政中央，而不是流亡政府，因為只要目前的西藏問題不解決，我們的政治職能就會繼續，但只要問題找到解決辦法，這個行政中央就解散了。瞭解行政中央的運作其實無論對中國民眾還是對流亡藏人來說都很重要。要知道，在1959年以前，西藏是一個神權政體。被迫流亡後，達賴喇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啟動藏人領導機構的民主化進程。他首先建立了一個由人民代表組成的大會，這就是今天我們在達蘭薩的人民議會的早年雛形。

如今在達蘭薩拉有一個執行機構，洛桑桑格是領頭人，還有包括我在內的6名內閣成員。在此之外，有立法機構，由44人組成，他們是藏人代表；司法委員會是獨立的。議會每年有兩次會期，半年一次，分別在3月和9月，可以讓藏人發出自己的聲音，對執政機關問責，監督他們擔當起他們應當承擔的責任，藏人代表可以對他們提問，我們則可以借此說明一些政策。

達賴喇嘛不是退出政治， 而是結束了達賴喇嘛制度的政治角色

法廣：您是在達賴喇嘛宣佈退出政治生活的時候投身政治的。民主進程雖然已經啟動，但是，新政府是否也對

這種沒有達賴喇嘛的未來前景有所擔憂呢？面對達賴喇嘛這位享有國際聲望的精神領袖，民選產生的新政府是否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政治架構是否找到了一種平衡？

德吉曲央：要知道，其實，2011年時，達賴喇嘛不是退出政治，他的舉動遠比他退出政治還重要，因為他結束了達賴喇嘛制度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就是說他並不是因為年事已高而隱退，而是因為體制變了。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變化，因為達賴喇嘛制度承擔世俗和政治權力幾乎有5個世紀的歷史！這是達賴喇嘛政治管理體制民主化設想的最後一個階段。他一定是深思熟慮後做出的決定，為的是保證這種體制能夠長久存活下去，既不依賴他個人，也不依賴達賴喇嘛制度。

的確，正如您所說，他的這項決定在藏人社團中引起很多憂慮和不安，這種擔心是有理由的。但是，兩年過去了，一切運作得都很好。

中間道路可以讓漢藏兩族人民受益

法廣：在這個藏人行政中央裏，像您，像司政洛桑桑格等人此前接受的都是西方教育。行政中央在西藏問題上的政策和解決問題的遵循的路徑，是否因此會與達賴喇嘛時代有所不同？行政中央也許繼續遵循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但是，達到目的的方式、可以選擇的路徑是否會有所調整？

德吉曲央：我們其實都在思考這些重要而且很合情合理的問題，因為我們這個行政中央不僅標誌著達賴喇嘛的政治權力轉交給藏人民選代表，而且同時也代表著領導權力在兩代人之間的傳接。

毫無疑問，我們都相信中間道路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最好路徑，我們堅信這個政策，也會盡一切可能遵循這條路徑去解決問題，這條路徑不僅很現實，也是可以實現的，是一種深思熟慮後得出的折衷妥協辦法，可以讓漢藏兩族人民都從中獲利。

大部分藏人支持中間道路， 獨立只是少數人意見

法廣：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在過去這些年間也一直受到來自激進力量的質疑和壓力。行政中央是否面對同樣的壓力，又如何應對？

德吉曲央：那些主張獨立的人聲音很大，喊得很凶，給人感覺他們好像是多數，但其實，大部分藏人支持中間道路。就在不久前，在2010年，藏人議會全體一致通過，將中間道路作為我們政府的政策。所以，我們相信我們擁有人民的支持。國際社會也許會有這樣的印象，認為藏人支持獨立。其實這只是少數人的意見，這些人往往很年輕，又很活躍，讓人感覺好像他們代表大多數藏人的意見。事實並非如此。

西藏當地的政治氛圍很微妙

法廣：您在中國、在西藏都生活過一段時間。這段生活給您留下怎樣的印象？您此前對這個遙遠故鄉的想像是否因此有所改變？

德吉曲央：在體驗西藏生活之前，我首先體驗了在北京的生活，這段經歷非常有益，無可比擬。在那裏我更多地瞭解了中國文化、中國人，還學習了漢語，這段生活我收穫頗多。在北京生活幾年後我才首次參觀西藏。

至於在西藏的實地體驗，當然我在那裏看到了經濟上的進步，這是無可置疑的，但是，在當地生活多年之後，我也意識到藏人的確有被漢人同化、失去自己的語言、失去自己的文化認同的危險。

當地的政治氛圍很微妙，初來乍到的人有時候很難注意到，但是居住一段時間後，我們可以體會到有一種恐懼和鎮壓的氣氛，人們在與外國人或者與不熟悉的人交談、表達自己對政治問題的個人見解的時候，非常謹慎。

西藏問題對中國政府是一個巨大的道義挑戰

法廣：中國對於您來說意味著什麼呢？是外來侵略者？是更好解決西藏問題必須聯合的角色？

德吉曲央：我想，藏文化的一大特點——這同時也是佛教文化的影響，是不要仇恨，憐憫心很重要。作為人，我們都有相同的潛力，所有人都彼此互相依賴，無論我們身在何處。對於我個人來說，中國是西藏的鄰邦，是我們曾與之和平共處過幾個世紀的民族，這種和平共處如今仍然是可能的。

中國文明有數千年的浩瀚歷史，這個民族十分勤勞，我們可以從中有所借鑒。這也是一個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歷了很多諸如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政治衝擊的民族，經歷了很多苦難。

我想，我們可以試著與中國人在一些共同點上搭建橋樑。比如，我們的共同點之一就是，藏傳佛教文化遺產既可以對世界也可以對中國做出貢獻。同樣，西藏高原的生態環境非常脆弱，亞洲各大河流都發源於此，西藏高原的環境治理不僅影響中國而且也影響周邊所有國家人民。漢藏兩族人民的另一個共同之處，就是我們都希望給子孫後代留下一個和平的國家和地區。

我覺得，對於中國執政當局來說，西藏問題是一個巨大的道義挑戰。如今，中國在國際上政治和經濟角色越來越重要，他目前所缺少的是一種道義上的威信。如果他們能夠——尤其是在達賴喇嘛還在世的時候，找到一個解決西藏問題的折衷辦法，這一定將帶給中國一種道義上的威信。

法廣：最近幾年，藏區頻繁發生自焚事件令世人痛心不已，但同時，中國的官方媒體連續數年將西藏首府拉薩

列為中國最幸福城市，您怎麼看這種認知差距？您是否能理解這些藏人以自焚方式表達的痛苦？您在西藏生活期間是否感受到那裏的“幸福”？

德吉曲央：我想，這要看怎麼定義“幸福”。如果只看物質條件，的確，大家都有地方住，有足夠的糧食吃，汽車也越來越多，但是，對於藏人來說，文化認同和作為一個不同民族、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價值觀的權力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以從自2009年以來的自焚事件中看到的是，到目前為止，已經有120人自焚，這些自焚藏人來自藏區各地，年紀在十六、七歲到，六十四、五歲之間，他們來自社會的不同領域，有僧侶，有尼姑，有大學生，有藝術家，有遊牧者，有農民，其中也有女性。我想，他們是在向漢人，也是向國際社會傳達資訊，告訴他們不要以為西藏一切都好。我們沒有像中國政府諸如中央電視臺CCTV等那樣完善的傳媒手段。對於藏人來說，自焚是明確告訴人們當地情況不好、需要重新審視藏區政策的方式。

藏人行政中央三分之一成員是女性

法廣：婦女與家庭節目是一個主要關注女性地位和女性權益話題的專欄。您作為一名從政女性，是否可以介紹一下藏人社團中從政女性所面對的問題，藏人從政女性是否與其他地區的從政女性面對同樣的問題？

德吉曲央：我們當然也面對如何既照顧家庭又不耽誤工作的難題，但整體來說，在藏人社團中，女性的地位還是得到認可的。就以藏人行政中央而論，6名閣員中，就有兩名女性，也就是三分之一，而且這兩位女性主管的也是藏人社團兩個最大的部門，我負責外交和新聞，嘉日·卓瑪負責內政部，主管在印度、尼泊爾和布丹等地的藏人事務，這很好地體現著藏人社團中女性的地位。而且，在流亡藏人中，女性受教育程度最近幾十年也明顯提高。我覺得我們的確可以為流亡藏人中女性地位的進步感到自豪。

在西藏地區，尤其是在市區，女性的地位也在改善，無論在拉薩，還是在東部藏區，還是在北京、成都，蘭州，西寧等大城市的藏人社團中，女性地位都得到認可，但是，在那些農村地區，遊牧人群中，則確實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他們的生活方式仍然很傳統，我們雖然沒有穆斯林社團的那種隔離歧視制度，但是，的確還需要進步。

西藏的未來取決於西藏藏人的選擇

德吉曲央最後補充說：我想向你們的聽眾表達這樣一種願望，就是他們對西藏文化能有更多興趣，更多的關注。藏人行政中央的立場是中間道路，希望找到藏區既是中國的一部分，又有一定自治的解決辦法，我們堅守非暴力。我們能理解中國政府無法在一日之內就改變

在西藏的政策，但是可以逐步改變，讓藏人看到一點希望，知道中國政府聽到了他們的絕望。在西藏，如今已經有一、兩代人是在漢人佔領下出生的，他們所經歷的唯一國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對於我們來說，西藏的未來將由西藏的藏人，而不是流亡藏人，來決定。我們只是敲開對話的大門，但一旦做到這一步，一切由西藏的藏人來決定。但在中國內地，尤其是在大城市，越來越多的人對藏傳佛教、對藏族文化感興趣，我們希望這種關注能夠通過政治支持表達出來，以便能為西藏目前的形勢找到出路。

----法廣

日本作家出書描述 藏人自焚背後的原因

【西藏之聲8月9日報導】旅居印度北部達蘭薩拉的日本作家、建築師中原一博（Kazuhiro Nakahara）先生於本週三（7日）在其博客隆達上發表了以日文撰寫的新書《為了迎回太陽，藏人在自焚抗議》。

中原一博（Kazuhiro Nakahara）先生出版的新書《為了迎回太陽，藏人在自焚抗議》，總共有342頁組成，分為兩個章節。第一章是圍繞造成藏人自焚的因素進行描寫，第二章詳細記錄了124名自焚藏人的情況，最後分析了藏人自焚的原因並對自焚者表達同情與支持，其中還插放了日本援藏畫家井早智代（TOMOYO IHAYA）女士為自焚藏人創作的繪畫作品。

新書作者中原一博在接受本台專訪時表示，（錄音）日本方面對西藏問題的報導是很稀有的，在加上日本人沒有積極學習英語的意向，更不懂藏文，造成了日本人很少瞭解西藏正在發生的真實情況，希望通過這本書能夠使日本人瞭解藏人自焚背後的原因。中原一博先生表示，新書現在只是發佈在博客上，有意向將來通過出版社在日本社會問世。

中原一博先生在其博客上寫到，對於藏人來說毋庸置疑“太陽”就是達賴喇嘛尊者，境內藏人們冒著生死危險把境內發生的關於自焚者的真實情況送往境外，這讓我感覺到如果在日文上缺少關於這方面的描寫是很可惜的事情。在這之前我已經在博客上一直記錄著藏人的自焚抗議事件，它已經初步完成了這本書的原形，再整理起來已經很容易了，但遺憾的是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又有一名藏人為了抗議中共高壓政策自焚犧牲。從2009年開始這是第125起自焚事件，而我的這本書沒有涉及關於他的描述。我祈禱西藏的現狀能夠得到改善，不要再發生這樣的自焚事件。

據瞭解，中原一博是一名日本建築師，從1985年開始在達蘭薩拉生活了28年，他不僅設計了達蘭薩拉諾布林卡，西藏前政治犯九·十·三運動大樓，還設計了德拉頓佛塔，噶瑪巴仁波切在菩提迦耶的寺院等。

印南舉行達賴喇嘛尊者 78歲華誕慶祝活動

資料來源: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網

2013年7月6日,是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78歲華誕,這一年的尊者慶典活動在印南沙拉寺傑巴紮倉隆重舉行,上萬西藏僧俗百姓和來自各國的嘉賓以及寺院施主參加了慶典活動。

活動從上午9點30分正式舉行,活動開幕時全體人員起立分別歌唱印度和西藏國歌,然後由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向尊者供奉曼筭三所依,祈願尊者達賴喇嘛健康長壽。

多名印度官員出席了活動,包括印南卡那塔克邦首席部長Shiri Siddaramaiah,阿魯那嘉邦首席部長Shiri Nambam Tuki,印度國會議員Shiri H.Vishwanath 卡那塔克邦合作公司總管Shiri HS Mahadeva Prasad,卡那塔克邦議會議員Sri K.Venkatesh 該邦議員Sri HPManjunath,麥索州州長Shiri V.Srinivasa Prasad以及西藏人民議會代表洛桑念紮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等。此外,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沙拉寺主管等宗教界人士也出席了尊者華誕慶典儀式。

卡那塔克邦首長和阿魯那嘉邦以及各宗教領袖們在活動上分別發表了精彩的講話,其他印度官員都依次發表演說,高度評價尊者為世界和平,乃至為眾生的快樂所作出的努力,同時祈願尊者長壽永駐,希望西藏問題能夠盡快獲解,尊者回歸故土。

司政洛桑森格講話表示,在西藏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78歲華誕的歡快時刻,我代表噶廈和西藏境內外的所有藏人,懷著最深的敬意鞠躬並獻上我們的尊重。噶廈的所有閣員和所有的藏人與全球各地千萬的傾慕者一道在此祝尊者身體健康、長壽!我們獻上我們的祝願並重續我們毫不動搖的跟隨和忠誠,給尊者達賴喇嘛一吉尊 降白阿旺洛桑益喜丹增嘉措司松旺覺聰巴密白德巴桑布。

迄今為止,在西藏已有119名藏人自焚。他們的冤屈反映在因譜寫歌曲而被監禁的白馬赤列和恰多兩位年輕歌手以歌聲表達他們內心的話語。

我們在西藏的同胞,包括自焚者,明白無誤地表明他們的初衷是要尊者達賴喇嘛回歸西藏以及藏人獲得自由。流亡中和散居世界各地的藏人,尤其是新一代,必須

認識到這一追求,並把它作為一個神聖的職責。這是我們對境內的藏人最低的虧欠。它號召我們全面地去領悟尊者的領導力、思想觀點和為西藏和藏人描繪的願景。

藏人行政中央再次重申,在解決西藏問題上將繼續堅持奉行「中間路線」。自2011年8月噶廈組成以來,我們就已推進了包含鞏固、行動和對話三階段的方法。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表示:「今天非常高興,在我的生日慶典活動上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印度教等的各宗教領袖都參加了。就如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宗教在世界上廣為流傳,儘管各宗教在理論上有些誤差,但是歸根結底,所有教派的宗旨就是,如何要做一個好人,如何做一個真誠的人,如何推廣慈悲心等。

每當以宗教的執著和偏心去相互發生爭執,甚至發生動手殺人的行為,這的確讓人非常失望,因此將努力把各宗教領袖多聚一聚,相互多瞭解和諒解,結為友誼之手,只有這樣對千千萬萬各宗教追隨者,能夠製造出平靜的生活。

尊者繼續表示,不管能否參加我的生日慶典活動,居住在世界每一個角落的朋友們,如果你真的願意對我表示友愛,願意給我送上生日禮物,那麼你就從此做一個真誠的人,不要做對人有害的事,當你的情緒激動或者有骯髒的念頭時,請你記起我的臉,消除你那可怕的念頭,那才是您給予我的最珍貴的禮物。希望每一位元朋友記住這一資訊。

隨後,印南藏人社區共同向卡那塔克邦首長獻上禮物,以表感謝一直以來對藏人社區的照顧,同時沙拉寺麥紮倉堪布和當地藏人社區總管向尊者達賴喇嘛供奉名為「淨除世間黑暗」的華誕禮物。

在活動最後,藏人社區和當地西藏學生展演西藏傳統文藝後,沙拉寺傑巴紮倉堪布洛桑格列仁波切向前來參加尊者華誕的民眾致感謝詞,結束當天上午的主要議程。下午兩點繼續由各西藏部落和當地西藏各社區,以及學校進行表演了精彩的傳統歌舞。

慶祝達賴喇嘛生日遭 槍擊的詭異

陳維健

在西藏問題中共釋放鬆動資訊之際，7月6日達賴喇嘛生日，藏區道孚縣的僧侶在慶祝達賴喇嘛生日時，遭到當地的警方開槍鎮壓。在此鎮壓中二名僧侶被擊中頭部，多人受傷，多人被抓，過程中使用了催淚彈。儘管中共對西藏採取了暴力統治形式，但這樣一種慶祝性的，而非抗議式的活動，直接以槍擊的方式鎮壓，還是十分罕見的。

槍擊發生後，中共分管少數民族事務的頭面人物俞正聲，即表示必須旗幟鮮明地開展對達賴集團鬥爭，堅持中共的強硬立場。很明顯，這一槍擊事件所展現的立場，意在對早些時間所傳出的西藏政策鬆動的反擊。一個多月前，從政府修葺達賴喇嘛故居，中央黨校教授靳薇接受“亞洲週刊”的採訪，對西藏問題的思路及具體的建言：讓達賴喇嘛以宗教人士的身份訪問香港、澳門，進一步回到中國，以及關於達賴喇嘛在中國境內轉世等系列問題，直至官方正在解除禁止西藏懸掛達賴喇嘛法相的禁令，呼籲海外的藏人回故鄉居住，此時此刻，一直被中共視為干涉中國內政的美國駐中國大使駱家輝在西藏訪問，會見了當地的官員與民眾。事情發生得如此突然，又如此地迅速，讓人摸不著邊際。正當人們對此興奮與深感神秘莫測之際，達賴喇嘛生日慶祝遭槍擊，又是當頭一棒。

西藏政策鬆動的傳聞，雖然沒有官方媒體的正式報導與正式檔，但有三點可以說是確證無疑的。第一修葺達賴喇嘛故居，此新聞由“新華網”發出，標題為“十四達賴喇嘛故鄉有望成為中國最年輕的城市”。第二駐美大使駱家輝訪問西藏，美國國務院發佈了相關新聞與照片。第三靳教授在“亞洲週刊”的訪問。這三條被確證的新聞可以將其他新聞串連起來解讀，確實中共對西藏政策在作試探性的調整。特別是靳教授的建言，一個中央黨校的教授在中共最敏感的問題上，在境外中共控制的媒體上發言，不可能是個人的建言，只能來自中共官方。那麼為何在這一連串的新聞與傳聞之後，又即刻通過鎮壓達賴喇嘛慶祝會予以否定，可以說中共官方對西藏的政策出現了很大的分歧。

中共在槍擊前發出的西藏政策鬆動的資訊如果落實，雖然不能解決西藏問題，但可以緩和西藏目前的緊張局勢。西藏流亡政府新的行政中央首腦洛桑森格也發出：共產黨領導是可以接受，我們不挑戰執政黨的現行結構的講話。因此鬆動政策不會損害中共集團的整體利益，也不會因此影響中共的全面政策，而且中共為此還能得到國際社會的讚揚，改變在國際社會的聲譽。但很顯然中共主流執政意識，不同意這種鬆動政策，一些在西藏靠“維穩”獲得利益的部門也不認同政策鬆動。因為任何政策的調整，都會影響他們的局部利益。習近平上臺以來，中共最詭異的就是發出的資訊不同步，不同調，上下不一致，各地自行事，西藏方面也是如此。

達賴喇嘛慶祝會遭槍擊，再一次表明，解決西藏問題，解決中國問題，都必須首先解決中共的問題，只要中共的問題不解決，一切都難以改變。

[博訊首發]

英媒： 興建世界最高民用機場，經濟 利益幾乎都流出西藏

世界最高民用機場，今年下半年將啟用。不過英國《自由西藏》組織在英國媒體表示，機場的興建不是為了西藏，這類開發的經濟利益幾乎都流出西藏。

英國《每日電訊報》星期一引用中國官媒的報導，介紹了這座本年稍後將啟用的世界最高民用航空機場，稻城亞丁機場。這是一座位於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內，海拔高達4411米的機場，有四個停機坪，機場高度高過西藏昌都邦達機場。

中國當局表示機場建設的目標在吸引遊客，他們希望到2015年之前可以吸引至少一百萬名遊客，並提高旅遊收入達20億元人民幣。當局也宣傳，機場的興建將為西藏人民帶來工作機會，並繁榮地方。

不過英國《自由西藏》組織的發言人克裏表示，這並不是度假勝地，他說中國當局在西藏的開發投入是為了當局而不是西藏。克裏在《每日電訊報》表示，超過95%到西藏的訪客都來自中國內地，商業機會幾乎被內地移民或者已存在的內地企業所掌握。這類建設開發的經濟利益，幾乎都會流出西藏。克裏表示，藏族文化以及西藏的風光被中國當局當作是個可利用的資源，但是真正的西藏文化此刻卻受到嚴厲的打壓。

《每日電訊報》的報導也指出，上個月在新機場的附近也爆發事故。一群要共同慶祝達賴喇嘛生日的藏人，被中國安全部隊開槍驅散並對毆打藏人。《自由西藏》的克裏表示，藏人的抗議以及包括120名自焚抗議的藏人，他們的目的不是要工作或是經濟機會，他們要的是自由。

洲際酒店集團在倫敦的酒店六月份曾經遭到《自由西藏》組織的抗議，洲際酒店集團預計將在西藏首府拉薩興建新的五星級酒店。洲際酒店集團表示已經和《自由西藏》組織會面，聽取運動人士的關切意見。

在英國外交部近期三個月有關西藏部分的人權報告也指出，近三個月仍有5名藏人自焚的事件，並且更多藏人被以教唆或是榮耀自焚事件而被判刑事罪，此外西藏作家和音樂家被控以宣揚分裂主義。此外也有報導指，藏族人士在中國內地的旅行面對更嚴厲的限制。英國外交官員在此期間繼續要求到藏族自治區，不過仍舊遭到拒絕。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張安安發自英國倫敦的報導。

從藏人自焚，透視中南海智力缺陷

陳破空

自2009年發生首起藏人自焚事件以來，迄今，自焚藏人已達119人，其中，102人死亡。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抗爭，曠古未有，舉世無雙。

經由御用文人之口，中共當局以“自焚者只是少數”、“自焚發生在少數地區”為藉口，自我安慰，自我解脫。然而，慘烈的自焚方式，成百的自焚人數，即便發生在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地區（當然，也只能發生在中國），都堪稱驚人，都會讓世人一目了然：那裏的統治出了問題，而且是嚴重問題。

然而，作為統治者，中南海毫無反思、自省。面對藏人自焚，中共的表現，是鐵石心腸，無動於衷。中共的對策，是將責任轉嫁到境外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頭上。找不到證據，便把“沒有站出來公開譴責和反對”自焚，也當成是達賴喇嘛的“罪責”。中共的手段，則是，拿自焚者身邊人出氣，予以監禁、判刑，最高者甚至判處死緩。在觸目驚心的人間慘禍上，再加慘禍。

中共御用文人在分析藏人自焚的原因時，竟妄言藏人訴求之一是“經濟補償”——典型的經濟動物言論，俗不可耐；竟又妄言“東藏地區相對寬鬆的政策，導致宗教勢力回升”，所謂“東藏地區比西藏享有更大的宗教自由而帶來的相關後果”——不論東藏還是西藏，連最起碼的言論自由都沒有，又來的哪門子“宗教自由”？竟還妄言是因為“達賴喇嘛要回來”的傳言，導致“許多人想給自己留後路”——既然一句傳言就能影響“許多人”、就能引發這麼多大事，豈不當場戳穿中共所謂“達賴喇嘛只代表少數人”的彌天大謊？

中共主政者與御用文人的互相誤導，惡性循環，以至於，所有的思維，只會朝著一個方向傾斜，那便是：強硬，強硬，再強硬；對應的便是：血腥，血腥，再血腥。難怪，當外媒報導中共有可能在青海藏區放鬆打壓、允許藏人懸掛達賴喇嘛法相時，中共官方竟立即矢口否認——中共寧願當惡人，絕不做好人；中共政協主席俞正聲甚至出面揚言：“必須旗幟鮮明地深入開展對達賴集團鬥爭。”——政協之意，政治協商，作為政協主席，本應擔當民族團結的推手，卻充當民族分裂的罪人，角色倒錯，舍本趨末。

中共御用文人甚至誣指藏人“自焚行為與伊斯蘭極端勢力‘自殺式炸彈’沒有本質區別。”那麼，中共究竟指望什麼呢？不妨做一個逆向思維：

假如這102個藏人，不是自焚而亡，而是與中共硬碰硬抗爭，而遭中共軍警槍殺，中共固然覺得痛快，卻再度落下屠夫之名，歷史上再添幾筆血債。

假如這102個藏人，不是自焚而亡，而是自我裝備為“人肉炸彈”，襲擊中共目標，與中共黨政或軍警人員同歸於盡，中共固然可借此將他們妖魔化為“恐怖分子”，但中共本身付出的代價、由此承受的心理恐懼，可想而知。

假如這102個藏人，不是自焚而亡，而是組成“暗殺小組”，瞄準中共高官，如俞正聲之流，精心策劃，耐心等待，一舉出擊，無論成敗，對中共而言，都是巨大震懾、沉重打擊。

藏人自焚，並無傷及他人，對中共而言，已經是危險度最低的抗爭。指望藏人不自焚而又拒絕改變其殘酷的西藏政策，指望達賴喇嘛出面制止自焚而又不與達賴喇嘛談判，中南海的指望，等同於不切實際的奢望。“解鈴還須系鈴人”，這句話，應該用到中南海身上，而非達賴喇嘛身上。

藏人自焚的主要訴求之一：“讓達賴喇嘛回家。”中共主政者並非做不到，而是無情拒絕。僅從這一點，就可證明，中共主政者及其強硬、頑固、冷酷的西藏政策，就是導致藏人接連自焚的根本原因。讓達賴喇嘛回家，原本是一個雙贏的局面，中南海非要弄到兩敗俱傷。或許，中南海諸公自以為，自己傷得起，而藏人一方傷不起。那麼，讓後人拭目以待，在未來歷史長河中，究竟是藏民族活得久？還是中共政權活得久？

不指望中共主政者具有善心，只可惜，他們連聰明都不具備。對西藏和中藏關係起碼歷史知識的缺乏，是中共主政者的智力缺陷之一。中南海不時組織所謂“政治局集體學習”，何不抽空學一回西藏歷史？瞭解中藏關係的來龍去脈？惡補最基本的歷史和宗教常識，健全一個當權者最低限度的知識結構。

（文章只代表rfa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簡訊

現居澳大利亞的流亡藏人丹巴珠扎製作的紀實影片《最後的遺言》，榮獲澳大利亞人權委員會頒發的一等獎。

設立在悉尼的澳大利亞人權委員會近日以「請給我講個故事」為主題，舉辦反映人權問題的首屆短片評比活動，而居住在澳大利亞的流亡藏人丹巴珠扎製作的短片《最後的遺言》獲得了第一名。短片製作者丹巴珠扎在接受本台電話採訪時介紹說，（錄音）這部短片以2012年在該地區癌症患者，已故藏人政治犯桑傑成列，生前留給現居西藏境內，同為政治犯兒子的遺言為題材拍攝，以此向澳大利亞人權委員會和民眾宣傳西藏問題，使澳洲各界人士能夠更加關注西藏緊張局勢。

唯色評說西藏

1950年代“訪問”西藏的外國記者團

中共安排外國記者團進藏採訪是有傳統的。這是我在讀了中國藏學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兩本翻譯書後得出的結論。

一本名為《1955年西藏紀行》，原著俄文，作者是前蘇聯《真理報》記者奧夫欽尼科夫。當時，在中國總理周恩來的邀請下，在中國外交部新聞司的安排與帶領下，包括蘇聯、東德、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共產黨國家的記者，以及住在中國的幾位親中共的西方人，訪問了被“解放”的西藏。此書如同中國官媒的海外報導，用外國人的嘴講述了佔領西藏五年的中共打算對世界說的話。

這個外國記者團在拉薩還見到了時年20歲的尊者達賴喇嘛。如果此書所記錄的尊者講話屬實，那麼看得出尊者短短的講話如照本宣科的套話。作為被佔領者的代言人，實乃不得已而為之。

對宗教的仇視和貶低是共產黨人的特點。作為臭名昭著的前蘇聯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的記者並不掩飾這一點，他在看到布達拉宮壁畫所描繪的分佈在全藏各處的寺院時，形容說“仿若病人臉上的麻子”。

另一本書名為《百萬農奴站起來》，原著英文，作者是親中共的美國人安娜·路易士·斯特朗，早在日本侵華時期就去延安採訪休養生息、蓄勢待發的毛澤東及其軍隊，得到毛的青睞。她於1958年定居北京。1959年夏天，在3月藏人的抗暴被鎮壓、藏人的政教領袖達賴喇嘛被迫流亡異國僅數月，經中國國務院特批，在外交部、人民日報的安排與帶領下，包括年已七旬的安娜·路易士·斯特朗在內的19名共產黨國家的記者或親共的西方人組成的記者團訪問了被“解放”的西藏，自始至終享受著各種特權，如書中所描述的去拉薩時乘坐“豪華型”專用飛機，訪問羅布林卡時得到數百名被安排來的藏人夾道歡迎，等等。

因此，這本書根本不具備真正的新聞品質。既不客觀也不屬實，字裏行間全是中共宣傳部的“西藏之聲”。更荒謬的是，這位自我感覺極好的老婦人在講述3月間中共軍隊炮火鎮壓藏人時，竟說成是“叛亂分子的大炮開始了全面攻擊，布達拉宮、羅布林卡、拉薩制高點藥王山上火光沖天……”，她甚至把毀於解放軍炮火中的門孜康醫學院說成是“叛亂分子”所為。而她對獨具中共特色的“控訴大會”很是欣賞，這種由黨的幹部們發動的“控訴大會”充滿暴力，已經在中國各地奪去了無數被黨視為“階級敵人”的生命，又在藏地奪去了藏人社會中諸多中堅人物的生命。

需要補充的是，與今日中共安排外國記者團訪問西藏相比較，會發現不同的是如今來的記者基本上沒有共產黨

國家的，世界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前蘇聯變成了俄羅斯，東德變成了德國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已分為兩個民主國家。中共若要邀請同一陣營的吹鼓手來訪問，只剩下古巴和朝鮮等屈指可數且無信譽的共產國家了。當然沒那麼蠢笨的，自會去邀請容易統戰或早有默契的非共產國家的角色。

但也有相同之處。比如五十多年前的訪問內容與今日的訪問內容幾無區別，都無一例外地，要採訪“苦大仇深”的“翻身農奴”，聽他們控訴萬惡的“舊西藏”，讚美幸福的“新西藏”。甚而至於，當年的採訪路線與今日的採訪路線都驚人的相似，如採訪某個獲得新生的貴族莊園，在那裏，有黨挑選的“翻身農奴”在恭候著他們。

事實上，當這兩個外國記者團進藏採訪時，全藏地或者正在醞釀發生甚至已經發生藏人慘烈的抗暴，或者正遭到中共軍隊以“平叛”的名義進行的大屠殺。據藏學家艾略特·史伯嶺對一幅關於1982年中國進行人口普查而產生的性別比例圖的分析說：“……在整個圖伯特高原普遍的存在男女比例失衡，而事實上，唯一能解釋這種不平衡的原因只能是暴力鬥爭。”“由於無法自由獲得中國方面的紀錄，精確的死亡數位也因此不得而知。但是發生大屠殺的事實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2013年7-8月

（本文為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相關內容由自由亞洲電臺藏語專題節目廣播）

消失的沖賽康的前世

著名的沖賽康（Tromsikhang）位於八廓北街，在著名的朗孜廈（西藏噶廈政府原拉薩市政廳）斜對面，約在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六世達賴喇嘛時期建造，是拉薩城內的頗章（宮殿）建築，六世達賴喇嘛曾住過。故而“有寺院和高貴宅院的結合風格：沿中心線嚴格對稱，且為從下至上按等級的（最上層樓上有大陽臺和富麗的內部裝飾）。”在屋頂，有染成絳紅色的邊瑪牆作條帶，“表明其居住的是喇嘛住宅的意向用途。”當時名為“平措繞旦班覺”。還曾被控制拉薩的和碩特首領拉藏汗住過。而之後的歷史就複雜了，是激烈的歷史事件不斷上演的場所。

西藏歷史上，外力的介入導致外族的進入往往與很多複雜的因素有關。比如五世、六世、七世達賴喇嘛時代，為鞏固達賴喇嘛政教合一的權力或者早在迎請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等過程中，蒙古人（如和碩特部與準噶爾部等）與滿洲人接踵趁虛而入，實際上“一直未能脫離攝政時期詭譎多端與危機四伏的政治局勢”。而六世與七世達賴喇嘛期間，藏事紛亂，滿清雍正皇帝趁機派出第一任駐藏大臣，這是1727年。

需要說明的是，所謂“駐藏大臣”的說法只見於中文史

料。藏文史料稱其為“安班”（ཨ་པན།）。而“安班”是滿語“大人”的音譯，專指派駐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等地的滿洲皇帝代表，又稱駐紮大臣，正職為辦事大臣，副職為幫辦大臣，一般由滿洲人、蒙古人充任，也偶爾有漢人充任，但基本上是副職。在滿清中葉以後，不少赴藏安班“是因事掛職被貶職人員”。在西藏民間則流傳這樣一種說法：“安班”是英語 Ambassador（大使）的藏語發音，不是什麼大臣，而是大使。這個說法被證明為附會，但流傳甚廣，反映出藏人集體意識中對外來者的抵觸。大臣也罷，大使也罷，不過是鞭長莫及的滿清皇帝的官方代表。

曾因趕走蒙古準噶爾部在藏勢力而立下大功並任甘丹頗章首席噶倫的康濟鼐，以平措繞旦班覺為府邸。就在兩位安班去往拉薩的迢迢路上，康濟鼐被其他三位爭權奪利的噶倫於大昭寺內謀殺，他的兩位妻子則在平措繞旦班覺府內被殺。

之後，另一位深具野心的噶倫頗羅鼐將三位謀殺康濟鼐的噶倫擒獲，與藉口護送七世達賴喇嘛回拉薩的安班合作。安班趁勢攜眾兵而入，並在布達拉宮前的修赤林卡（法座園林）以滿清盛行的“凌遲”酷刑當眾處死三位噶倫，拉薩民眾從上至下從未見過“凌遲”，精神上備受驚嚇與折磨。攝持藏政的攝政王頗羅鼐餘生為之懺悔，在大昭寺供金燈為死者禱，而由安班帶來的若干外來刑具雖然極少使用，日後卻成了中共不停“揭批”有關舊西藏如何殘酷的“證據”。藏人歷史學家夏格巴·旺秋德丹所著的《西藏政治史》如是評說頗羅鼐：“為了保存自己的權力，過分與中國和好，造成滿洲的安班和以所謂（七世）達賴喇嘛警衛為名的中國軍隊進駐藏地，致使政務出現了如珠之脫串般的許多失誤，曲解藏漢供施關係的原義，最後造成了至今存在于漢藏之間的仇恨和爭鬥，使藏地不得安寧”。（注：夏格巴原著為1976年出版的藏文版，後由中國藏學中心翻譯為中文，屬以供批判的內部資料。此處引述的是該內部資料譯文。）

死于謀殺的康濟鼐的府邸——平措繞旦班覺府，被攝政王頗羅鼐改名為“沖賽康”，贈與留駐拉薩的安班，成為安班最早的住處，漢史中寫“通司岡”，意思是看得見街市的房子，也即臨街之廈。

1750年，由於頗羅鼐之子、繼續攝持藏政的攝政王達拉巴圖爾·居美朗傑（中文史籍寫“珠墨特那木紮勒”），因要求清帝撤回在西藏不斷滋事生非的安班及其軍隊，結果被兩位滿人安班——傳清和拉布敦設計在沖賽康內卑鄙誘殺，引發藏人憤怒，圍攻沖賽康，安班傳清自殺，安班拉布敦及其隨從、漢商百多人被殺，沖賽康成為血腥之地。

然而，藏史與漢史對此事件的敘述完全迥異，後者把安班的卑鄙誘殺稱之為“正法”，而在夏格巴·旺秋德丹所著的《西藏政治史》裏，攝政王居美朗傑“是一位敢於為西藏佛教和政治犧牲生命的膽識過人的國家英

雄”，因為他在四年執政期間“能使其父親時期因失策而引來的中國人官兵大部撤走，並從滿洲皇帝那裏得到了留下的官兵也不准對西藏的內外政治進行任何干預的檔。不僅如此，還致力於將留下者在短時期內驅逐，並一直主張在本土建立必要的武裝力量”。于韶華之年喋血沖賽康、喪命自家門口的西藏攝政之王居美朗傑，實際上根本不是被中文史籍、今朝御用學者百般詆毀的那種“餘孽”、“叛首”。

兩個安班的暴死，使得之後的安班再也不敢囂張。繼任的安班來到拉薩後，在沖賽康的南面修建了一座小佛堂，以紀念殺人反殺己的倆安班，稱其為“雙忠祠”，“肖像以祀”，後任安班還要“春秋致祭”。或許繼任的安班不敢再住血腥瀰漫的沖賽康，而是搬至名為“桑珠康薩”的宅院，屬於被前任安班誘殺的攝政王居美朗傑遺下的府邸，可能有雪恨之意吧。

1792年，清將福康安受邀入藏與尼泊爾廓爾喀人作戰獲勝，而後為他的叔叔——誘殺攝政王居美朗傑的安班傳清立碑，據記載是六塊碑碣，分別鑲嵌在沖賽康入口門廊的東西兩側的石壁下部，有介紹說用滿文、漢文、蒙文、藏文四種文字分別記載了攝政王居美朗傑被安班“正法”、安班“殉難”的“事蹟”。直至1997年拆毀沖賽康時，還有五塊碑碣猶存。隨後，碑碣被挪走，收藏於拉薩市文物局。有資料說其中三塊漢文兩塊滿文，字跡有的清楚有的不存，並未提及有蒙文和藏文。而這五塊碑碣，如今都被中共當局派上了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新用場。

這才是使用時間最長的“駐藏大臣衙門”，位於今拉薩朵森格路1號，為西藏軍區第二招待所。

隨福康安入藏，時任安班的和琳用“桑珠康薩”換下位處大昭寺西南方的“梅朵吉彩”（鮮花遊樂園），屬拉薩貴族多仁的林卡（園林），在此修建了自稱的“衙門”，並在門口立了一對石獅，故被藏人稱此處為“朵森格”，即藏語的石獅，類似普通地名，並無今日宣傳的含有敬畏之意。1959年被中共設為西藏軍區警衛營駐地。1980年代，改成了西藏軍區第二招待所。

鑒於進藏之安班在185年間約一百多任總計138人，在拉薩的遺址還有幾處，據說一處在今天的西藏自治區政府大院，可謂古為今用，倒也算是繼承滿清之衣鉢，一處在今西藏話劇團後面，當年那可是雜草叢生的野地。安班還住過紮基寺附近的清軍駐地，可能就是今天關押政治犯為主的紮基監獄所在地吧。

最多住過六或七任安班的沖賽康，在安班搬走之後作了何用？沖賽康最初只有一座大庭院，由於有三個院門，所以有東院“節古夏”、中院“節古幾”、西院“節古魯”之稱，而東西兩院相通，中院之門最大。據知，後來西院曾是從屬西藏的不丹的官方代表每年來拉薩致敬和送禮時的住所。東院為郵政驛站，故沖賽康又被稱為“紮康”，即郵局之意。一層有數間尼泊爾人或尼泊爾藏裔開的店鋪。

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拉薩發生“驅漢事件”，沖賽康改為拉薩員警營，同時也有多戶藏人居民居住于內。1960年代以後則成了民居和居民合作社所在地，至2012年底啟動“整治”拉薩老城區之前，沖賽康內約有近百戶人家居住，僅西院就有40多戶人家。

我之所以要查證、轉載這麼多與沖賽康相關的資料，是因為想要知道，以“拉薩老城區保護工程”為名的“整治”，將對沖賽康意圖如何。

2013/6/11

（本文為自由亞洲電臺藏語廣播節目，分兩次廣播）

軟禁為的是消除“雜音”

許多媒體都報導了我和我先生在6月裏兩次被軟禁。月初的軟禁與“六四”有關。月中的軟禁與外交官、外媒記者訪問拉薩有關。其實當時我並不清楚會有哪些外交官去，只知道有一批外媒記者肯定會去。

差不多每年都有好幾次這樣的表演，基本上安排的都是遠在各國的外媒記者。這樣也就有利於“統戰”那些不瞭解中國更不瞭解西藏的記者，讓他們為黨領導下的“新西藏”鼓掌。有時候也有個別駐北京的外媒記者爭取到這個機會。他們深知若不參加由中國政府安排的記者團就進不去拉薩，當然參加的話，只能看到和聽到黨讓他們看、黨讓他們聽的西藏，而那樣的西藏是一個假像。

於是就有不甘心被擺佈的外媒記者開始做進藏前的功課，包括採訪我。但沒想到當局對此特別重視，6月19日，我剛見罷記者，便有七八個員警及國保出動，很快將我這個“雜音”及我先生軟禁起來，長達數日，完全隔絕與外界任何人見面。難道這樣做，外媒記者看到與聽到的就都是西藏人民幸福無比的景象嗎？當局對西藏真相如此忌憚，由此可見一斑。

按照這幾年上演類似荒誕戲的慣例，當外國記者團抵達拉薩，滿街的軍警會脫下制服，換上各種休閒裝，扮成遊客；藏人房頂上的狙擊手不會因此放假，反而會隱蔽起來，只看得見他們頭戴的寬沿黑帽忽隱忽現；至於針對整個城市所有藏人的各種網格化監控，則愈發無孔不入。

有外媒記者告訴我，事實上諸多外媒多次向中共當局申請去西藏自治區，總是被拒絕。而被拒絕的理由是“西藏當地政府不信任外國記者”。還扮委屈狀說他們也沒辦法，地方政府做主嘛。這個理由太不符合事實，難道西藏自治區政府已經獨立了嗎？難道西藏自治區政府做得了北京中央政府的主？

推特上網友對此諷刺道：“中國都是奴才當家說的算，主子當然沒有發言權。相對於中央政府，西藏地方政府是奴才……對奴才政府的行事規則和語言表達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維去理解。”

據悉中國外交部還很不滿地批評外媒：“為什麼西方媒體對中央政府的西藏決策有偏見？這就像有一個婚禮，一個美麗的新娘在房間裏，但每個人都希望把重點放在垃圾上。”這個比喻很是耐人尋味。美麗的新娘是誰？隱身的新郎是誰？而垃圾又是誰？可是，既然中國政府認為西方媒體對西藏的報導是對垃圾的報導，又為何要精心安排外媒去拉薩？是出於“治病救人”的崇高目的嗎？講述這段經歷的外媒記者說當時很震驚，心想中國政府竟用垃圾做藏人的比較。

而推特上有網友表示，“要是記者知道不單單政府，很多中國人都這樣想（即認為藏人是垃圾）就更震驚了。那些高喊‘統一民主新中國的’，是不準備讓這個新中國裏有任何非漢人的，除了漢化就是死路一條。”還有網友說：“連採訪都要被刻意安排，這就足以證明了西藏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真實’，不存在所謂的‘自由’。

“你究竟有幾套偽裝服？”其實拉薩滿街巡邏的軍警一下子換上了各種休閒服很平常，很常態，算不得什麼。讓人驚訝的是，有時候他們會穿上袈裟，有時候他們會穿上藏裝，有時候他們會戴上白帽子裝回族。不過拉薩人早已見慣不驚了，幽默地說：如今我們中國實在是太富裕了，所以給保衛我們的子弟兵準備了至少五套不同身份的服裝。

2013/6/23

（本文為自由亞洲電臺藏語廣播節目）

憶2008年境外記者團進藏

6月中，我們被軟禁之後的第三天，中國西藏網報導“6月16日至20日，以比利時記者協會主席安德列·布伊茲為團長的比利時、丹麥、荷蘭記者採訪團來到西藏進行採訪。”還說：“本次歐洲記者團早已不是第一批來藏採訪的境外記者。把境外記者請進來，讓他們用自己的雙眼見證西藏現在，是中國政府和西藏人民向外界澄清分裂勢力謊言，還原真相的舉措之一。”

這讓我想起五年前的兩個事件。

2008年3月26日，包括美聯社、卡達半島電視和多家港臺媒體等17家媒體約20多位元記者抵達拉薩。這是3·14之後，第一批中國境外媒體獲准進入西藏採訪，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辦，全程都有中國官員陪同，便衣跟隨。

當其時，拉薩街上的軍人大為減少，設在街頭的檢查站被撤，從19-24日連日頒發的通緝令暫停。但第二天上午，這些以外媒為主的記者在參觀大昭寺時，至少有30多名年輕僧侶公開表達抗議。結果，原本打算展示西藏多麼幸福、宗教信仰多麼自由的獨角戲，穿幫了。

大昭寺三十多名僧人沖出佛殿，圍著記者們，用不太流利的漢語哭訴：“不，我們沒有自由！達賴喇嘛是無

辜的…” “那些朝拜的人，都是幹部假裝的，都是騙人的…” ，這一幕據報導大概持續了十五分鐘，中共官員們尷尬至極。

而去拉薩看“幸福西藏”大戲的記者們，終於看到了最具有新聞效應的驚人一幕，被當局操控的拉薩之行，轉瞬間使操控者原形畢露。而這一刻不但立即出現在許多國家的電視上，還出現在遮天蓋地的網路上。當時在YouTube上搜索Jokhang，前十頁至少有十多個相關短片。

數月後，又一個外國記者團訪問拉薩，其中的英國衛報採訪了西藏自治區宗教局局長，詢問大昭寺那三十多位披露真相的僧人近況。宗教局局長否認說他從來沒聽說大昭寺發生過這回事，而“寺院的僧人對於政府的政策與照顧，都非常滿意，非常感激。”但事實上，這些冒著極大風險向外媒記者傾訴真相的大昭寺僧人，有兩人被捕了，有些人被還俗了，有些人雖然還在寺院，卻受著煎熬。

2008年4月9日，中國外交部組織外媒記者團到甘肅省藏區。在訪問拉卜楞寺時，二十多位僧人舉著自己畫的雪山獅子旗和寫的標語跑出佛殿，用藏語呼喊“我們要求人權，我們沒有自由，我們要達賴喇嘛回來”。還用英語喊“西藏要自由”。

隨後，有十多個僧人逃走了，藏在牧場上，被牧民們掩護。但他們在跟外界用手機聯繫時，被當局監測到所在位置，於是深夜被突襲，僧人們四散而逃。有幾人逃脫，躲躲藏藏，後來逃到了達蘭薩拉。僧人桑傑嘉措在一年的顛沛逃亡中病故。還有兩人被捕，被判無期徒刑和15年。

其中最慘的是37歲僧人嘉央金巴。會英語的他當時用英語喊“西藏要自由”。於當晚被捕。拘押15天后放出來時，“不僅雙目失明且全身骨頭都被砸碎站不能站睡不能睡”，不到三年悲慘離世。

中共稱邀請外國記者團，“這樣的活動打開一扇窗，讓西藏人民有底氣、有理據地告訴世界‘真實的西藏’。”此話沒錯，可當大昭寺僧侶、拉卜楞寺僧侶“有底氣、有理據地告訴世界‘真實的西藏’”之後，為何會遭到可怕的迫害？慘死的嘉央金巴魂安在？

2013/6/28

(本文為自由亞洲電臺藏語廣播節目)

延伸閱讀：

- 1、拉卜楞寺僧人們向外媒訴說真相的視頻：
 - 2、大昭寺喇嘛冒死哭訴 哀求境外記者揭露真相<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414>
 - 3、嘉央金巴：“放出來時不僅眼睛失明且全身骨頭都被砸碎……”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4/blog-post_08.html
- 發帖者 Tsering Woeser

藏人行政中央中文網站遭駭客襲擊

美國之音華盛頓 — 西藏流亡政府說，駭客攻擊了它的中文網站。在此之前，一家電腦安全公司警告說，流覽這個網站的訪客的電腦將面臨染上一種能夠使他們被追蹤的間諜軟體的病毒。

藏人行政中央的發言人紮西平措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們設在印度的政府機構雇員無法登陸這個網頁，他說目前還沒有多少有關這次網路攻擊的細節。

他說：“我們所知道的是，藏人行政中央的中文網站受到攻擊。我們無法登陸我們的網站。我們處理網路維修和安全的部門正在調查此事。”

紮西平措還無法證實卡巴斯基實驗室（Kaspersky Lab）的警告。這家網路安全公司警告說，西藏流亡政府的中文網站可能已經被染上病毒，登陸這個網站的訪客電腦將被傳染。

這個事件表明北京可能正在試圖監視西藏活動人士和登陸其網站的其他人的動向。

紮西平措說：“這是一個合理的問題，因為我們知道藏人行政中央的網站過去遭受過這類襲擊。”

紮西平措說，最新的網路攻擊事件的來源還沒有確定。但是他承認過去針對他們的大多數網路攻擊來源於中國。中國當局把達賴喇嘛看作是主張暴力的分裂分子。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自1959年藏人反抗中國統治的起義失敗後一直住在印度的達蘭薩拉。現年78歲的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在那裏推動讓西藏實現更大程度的自治。

卡巴斯基實驗室星期一表示，自2011年以來，藏人行政中央的網站一直受到同一組駭客的攻擊。藏人行政中央的英文網站在星期二看起來運轉正常。

另據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網站,8月15日,藏人行政中央發表聲明,指出經過專業人士的修復,被植入的病毒已清除,網站恢復正常,因此,告知“廣大‘西藏之頁’讀者,可以安心上網,流覽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網站。聲明中還表示,“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網站的全體員工,感謝大家的支持,對造成的不便請多包涵。”

拉薩網格化 --- 北京專家設下天羅地網、銅牆鐵壁

作者：經濟學人

譯者：台灣懸鉤子

北京來的數十位援藏幹部正要結束三年借調拉薩的任期，準備回中國，他們的工作將在七月上旬由中國新調來的另一批人接手。這一群即將調回北京的幹部之中，鄧海傑很可能在黨論功行賞時獲得誇獎，因為他在拉薩建立了一套新的監視系統。

這個系統在2012年4月建立在拉薩的城關區，也是鄧海傑擔任黨委副書記、常務副區長的拉薩區域。這套系統被中國官方稱呼為「網格化社會管理」。它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利用網格工作人員搜集資訊，好讓官員更輕鬆地測知是否有人想要惹麻煩。拉薩的城關區涵蓋了拉薩市的大部份區域，以及外圍的一些鄉區，已經被劃作175個網格。網格的面積故意設計得很小，以利收集詳細、即時的資訊。幹嘛這麼麻煩？拉薩市已經到處都是維穩部隊走來走去，監視攝影機也到處都是。即使在網格系統尚未設立之前，任何高舉抗議旗幟的人，都會在幾秒之內就被員警抓走。（其實在2008年的暴動以後，因為警力大增，這樣的抗議事件已經很少）。然而這兩年抗議者開始用自焚的形式表達抗議，當局更加緊張。大約120起自焚事件中，只有兩起發生在拉薩，但是拉薩是圖伯特信仰的中心，此地發生任何不滿當局的異議活動，都特別有震撼力。

去年在拉薩祖拉康（大昭寺）外面自焚的兩個人，就是網格系統專門想要監視追蹤的對象。這兩個人都是從外地來到拉薩，據信在某家餐廳裏工作。這樣的外來民工比起登記有案的拉薩居民更難掌控。根據紐約的「人權觀察組織」的說法，兩起自焚事件發生後，已有數百名外來的博族民工被驅逐出西藏自治區。

網格監督系統對鄧海傑而言並不生疏。他曾經在北京的東城區擔任街道辦事處主任，也是早在2004年就開始實行這套方法的中國首善之區。去年他告訴《西藏日報》，說北京東城區與拉薩城關區在維穩工作上有許多類似的地方。他並沒有說明兩個地區究竟如何相像，然而明顯的相似之處是東城區涵蓋了北京政治最敏感的地區，包括天安門廣場。鄧海傑說城關區將會以東城的「先進經驗」為榜樣。2012年4月拉薩市市委副書記、市長多吉次珠特別到北京東城區參觀，以學習這套系統是怎麼運作的。

東城區聲稱這套系統獲得大成功。東城區被劃成589網

格（每一格中約有1500位永久居民，跟拉薩差不多），每一格的動態都顯現在東城區的街道辦公室的螢幕上，這裏的資訊來自配備著智慧型手機的網格工作人員，他們把任何可疑的事情都拍下來，不管是倒下的路樹還是街頭抗議者，這些附有經緯座標的照片接著就會被他們回傳到監控總部裏。東城區的口號是：「小事調解不出網格」，意思是問題在萌芽狀態就被會處理掉。北京東城區與拉薩城關一樣，每一個網格大約配有六到七位工作人員。東城區每個網格配備一個警員與一個消防員。拉薩則多一個宗教事務員。這些網格還有確保老人與病患得到照顧的功能。然而確保穩定是優先任務。

北京與拉薩的網格工作人員，還由穿著紅臂章的積極份子組成的巡邏隊幫忙，這些人早在網格系統建立以前就長期作當局的線人與告密者。人權觀察組織說，在拉薩，這些人因為最近自焚事件頻傳，所以變得更積極，常常入侵民宅搜查達賴喇嘛的照片、或其他的異議跡象。配合網格制度的實施，西藏自治區政府還把家戶再分組為五到十戶的單位（譯按：中國稱之為「聯戶」，美其名為「先進雙聯戶」，口號是「聯戶平安、聯戶增收」），指定一人作戶長，任務是擔任網格官員的連絡人，或者在員警想要該聯戶中某些成員的資料時，配合提供。五月時，西藏黨委書記陳全國說這些雙聯戶應該成為網格化管理的「最基本單位」，「以確保無盲區」。

今年二月，負責涉藏事務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批示網格系統應該要擴展到其他地方，以形成維持穩定的「天羅地網、銅牆鐵壁」。北京希望拉薩所有的區域到今年年底開始實施這套網格系統。近年來，中國還有許多其他的城市也設立了類似的網格社會管理計畫，然而人權團體表示，它們都比不上西藏自治區狂熱維穩的程度。北京的研究人員在去年十二月的一個調查裏發現，拉薩居民是中國三十八個大城市裏面覺得最安全的。

<http://www.economist.com/news/china/21579848-help-experts-beijing-tibet-tightens-its-systems-surveillance-grid-locked>

—— 原載：《經濟學人》2013.06.20

長在圖博花園裡的異種 玫瑰：達瓦諾布

作者：潘美玲

達瓦諾布教授（Prof. Dawa Norbu），一個孤獨的知識份子，他是圖博社會流亡五十多年來，第一位也是當時唯一到西方留學並拿到博士學位的人，2006年5月28日病逝於印度德里，2010年10月有人以他的名字在臉書上開了一個帳號，上面寫著：「這個人先於他的時代。當他在世之時，他的社群從未能瞭解和認可他的貢獻。然而，歷史將永遠記住，他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及其著作的價值。」

我們圖博人也需對自己的悲劇負責：流亡經歷與學術達瓦諾布於1949年出生於圖博的貧農家庭，經歷了1959年中共入侵圖博的武裝衝突，達賴喇嘛出走，十歲的他和家人也隨後流亡到印度。到了印度之後，他並沒有接受傳統圖博教育，而是到西方教會辦的寄宿學校 St. Stephens College（聖史蒂芬學院）就讀，1973年以英文寫作出版 Red Star Over Tibet（圖博上空的紅星），該書主要是以一個兒童的角度，同時透過他母親的敘事，紀錄1959年前後在家鄉所發生的事情，對當時圖博傳統社會文化生活有非常詳細的描寫，中共到來所造成翻天覆地的影響，進行了第一手的觀察。

該書提供了傳統圖博社會面對共產社會體制的常民觀察與反應，根據他的觀點，當時的舊圖博政府是腐敗無能的，是封建主義的；而中共的統治「儘管借用了一切革命的辭藻，從根本上來說，是殖民主義的，不人道的，暴虐的。」他同時追究藏人的病根，尤其是上層人物的瀆職，「我要斷言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我們藏人對我們自己的悲劇是負有責任的」。雖然達瓦諾布完成這該書時，還是24歲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但三十年下來，這本書依然是研究圖博當代社會和歷史的英文經典之一。

1972到1976年間，他擔任 Tibetan Review（圖博評論）的主編，這是一個以英文出版的雜誌，提供各種有關圖博事務的觀點，財務上和觀點上力求獨立於政府和任何利益團體，雖然在達瓦諾布任職期間，該刊物因為財務困難，而必須接受流亡政府的協助，但他們仍維持一貫的獨立主張，對流亡政府也同樣提出批評。隨後他到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就讀，1982取得博士的學位，他的論文「Marxism,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The Rise of Neo-Nationalism in Communist Countries」（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和革命：共產國家新民族主義的興起），處理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如何共存的問題。19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主張「工人無祖國」，強調階

級革命超越國界，唱的是國際歌，但當代共產國家卻表現了強烈的民族主義。他指出，這個矛盾現象，是因為反資本主義的普羅階級和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者，剛好面對的是同樣的敵人：「帝國主義同時也是殖民主義」，也就是說，在當時國際政治環境脈絡下，造就了對立的兩種意識型態可以結合的條件，進而構成共產國家的特色。

主張圖博文化主權獨立的知識份子

回到印度之後，達瓦諾布並未在流亡政府尋求官職，而是到德里的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尼赫魯大學）中亞研究系任教，除了發表期刊論文之外，也相繼出版了 Tibet: The Road Ahead（圖博：未來之路，1998）、China's Tibet Policy（中國的圖博政策，2000）、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Third World Nationalism（第三世界民族主義的文化與政治，2001）等書。達瓦諾布試圖從當代第三世界國家民族主義的發展經驗，提出中藏關係的新見解，並思考圖博問題的出路。

作為一個歷經流亡的圖博人，達瓦諾布見證了圖博當代歷史的變遷，面對民族命運的困境尋求出路，並以此作為其個人學術生涯的知識份子使命，他在書中寫道：「親身的經驗幫助我看透那些捉摸不定事物的內在動力本質。因此，我將民族主義看成一種普世的類別，但卻是透過特定的文化媒介而產生的，對活生生傳統的親身經歷，使我能夠成為局內人，並因此與眾不同。」社會科學的現代教育訓練，讓他能夠以更開放的格局，從國際關係和現實政治的結構角度，尋求解決之道，因此在 China's Tibet Policy 一書寫道：「這是一個對圖博問題沒有預設立場的研究，包括從最早的中藏關係，到後來共產黨佔領圖博的權力、政策和執行都一樣。就如同我一貫所主張的精神：對話、討論和辯論。」儘管如此，他依然強調唯有尊重圖博文化主權獨立，才是解決問題的基礎，否則任何對話都是空談。

由於受到西方社會科學的學術洗禮，他從民主政治的角度，對於流亡政府的封建作為提出批評，在當時依然保守的流亡社會中，此舉被認為是破壞團結：在國家存亡危急之際，救亡圖存是最高使命，大家都應該砲火一致地對外，為何還要暴露自己的問題，落實中共的宣傳口實？加上他的教會教育背景，使得他經常被批評為共

產主義者、無神論者、世俗主義者，甚至被懷疑為中共間諜，遭受到各式各樣的譴責以及人身的攻擊。為了防止情勢失控，達賴喇嘛曾經出面公開呼籲：「這是一株長在圖博花園裡的異種玫瑰，雖然品種不同，但因為有這株玫瑰，才使我們的花園更美麗，我們應該保護他，而不是將他拔掉。」但整個過程，導致他承受極大的壓力，而造成精神上的疾病抑鬱而終，在58歲就英年早逝的原因。

長在圖博花園裡的異種玫瑰： 時代的先知

近年從事流亡藏人社會經濟的研究時，一直找不到圖博相關的社會科學研究文獻，直到發現達瓦諾布的研究。他的研究是走訪藏人定居點的觀察，而所發表的論文和專書章節。我曾在2006年年初寫信給他，希望到印度進行田野時，有機會向他請教相關的議題。然而，此時的他已經深受精神疾病之苦，無法跟我見面。當時回信和在印度接見我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在尼赫魯大學社會系的同事。雖然我還期待著未來他能夠病癒而見面的機會，但不久之後，就傳出他去世消息，這一面永遠再也不可能了。

2007年我有機會拜訪他的家人，跟仍保留著他研究室和宿舍的學校。在那佈滿塵埃的書架和凌亂的書桌上，排列著我很熟悉的發展社會學、第三世界國家研究等書籍，從這裡可以看出，達瓦諾布希望持續透過跨國比較的觀點，尋求對圖博問題提出超越兩邊對立的觀點，摒棄政府宣傳之陳腔濫調的努力。出乎我意料的是，在他的書房中，竟然蒐藏有翻譯成圖博文字的台灣海外政治反對運動刊物，可想而知，他也關注台灣和中國的關係，並希望從台灣的境遇和經驗找尋可能解決的線索。在那一刻，我真正覺得沒有機會向他請教，實在是莫大的遺憾！

雖然達瓦諾布已經離開人世，但隨著國際政治局勢演變，流亡社會內部民主化，以及圖博人接受現代教育的影響，越來越多流亡社會的年輕知識分子，開始注意到他的作品價值，體會到他對圖博前途的用心，進而將他尊崇為知識份子的典範，追隨他未竟的志業。雖然我沒來得及見到他一面，但那次的書房拜訪，卻如同見到他本人般的相會，心領神會他一生所要追求的理想。他不但是一個訓練有素的社會科學家，更是用生命將他的知識透過作品為他的圖博社會服務。由於流亡社會還是一個尚未成熟的公民社會，他進行的公共社會學行動，就像是圖博花園中的外國玫瑰，成為異類。

再過一個月，就是達瓦諾布辭世七週年紀念，僅以此文紀念這位孤獨先知的學者。

(註：作者任教於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標題原文：長在圖博花園裡的異種玫瑰：紀念達瓦諾布教授

雜多縣藏民抗議採礦 被軍警鎮壓

雜多縣藏人自星期二起展開示威，阻止採礦隊施工，當局出動軍警戒備，星期五再有大批軍警抵達紮青鄉向示威藏民使用催淚彈和高壓電棍等進行鎮壓，致當地緊張局勢升級；而阿多鄉民眾與軍警對峙，傳其中一人以自殺抗議採礦。

本台於8月14號報導，大批採礦工人星期二（8月13日）分別抵達青海省玉樹州雜多縣的阿多鄉、紮青鄉和薩呼騰鎮（原名結紮鄉）準備開礦時，上千藏民在各自所在地展開示威，阻止開礦，當局隨後出動大批軍警對整個縣實施嚴管嚴控措施。

流亡印度的青海雜多縣藏人貢覺頓珠星期五向本台表示，從雜多縣境內獲得的可靠消息指出，由於雜多藏民持續抗議採礦，軍警分乘四十五輛卡車於星期五抵達紮青鄉用暴力鎮壓示威民眾。

他說：「裝滿軍警的共計六十輛軍用卡車今天（8月16日）抵達雜多縣，其中十五輛車駛向阿多鄉、四十五輛進入紮青鄉鎮壓。在傍晚約6點30分，數百名軍警抵達紮青鄉後向示威藏民警告說，『如果不自行解散離開，將全部殺死』，而民眾則回答說，『要殺隨你們，我們絕不離開半步。』於是軍警使用催淚彈和高壓電棍等對付示威民眾，不分男女老少任意毆打，還砸毀民眾的汽車和摩托車。」

貢覺頓珠表示，在阿多鄉，軍警和示威藏民陷入對峙局面。他說：「16號早上，十五輛軍用卡車和兩輛囚車抵達阿多鄉示威之地，要求藏民自行解散，但遭拒絕。正在那裡示威的藏民特設大門，掛上印有中國憲法有關環境保護條款的橫幅，中間再吊掛一幅巨型橫幅，上面印有習近平在大會上發言的照片及他發表的關於保護生態環境的講話內容，要求當局遵循國家憲法和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講話精神，停止採礦計畫、停止一切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軍警隨後試圖採取強制手段，但民眾的抗議持續加大，雙方形成對峙的緊張局面。」

貢覺頓珠表示，抵達阿多鄉的採礦隊在政府撐腰下於星期三試圖開礦時，藏民強烈抗議，最終得以阻止。

「8月14號，充當中共走狗的藏人次貢、博古嘎、巴查三人在阿多鄉對示威藏民說，中國憲法根本沒有所謂保護『山水土』的條款，應該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指示，讓採礦隊按期施工。當時曾為公務員的查波將中國憲法中有關環境保護的條款一一說給他們聽，令對方無話可說。查波還對在場民眾說，『我們展開的環保活動與世界七十億人口的生命有關，因此沒有必要失去信心。』民眾也表示，即使失去生命，也要保鄉護土，抗爭到底。在他們的堅持下，當天迫使採礦隊停手。」

貢覺頓珠表示，星期二抵達雜多縣三個鄉鎮的採礦工人中，在紮青鄉有約150人、阿多鄉有100多人、薩呼騰鎮（原名結紮鄉）有200多人；而抗議採礦的民眾在紮青鄉有1000多人、阿多鄉有約1200人、薩呼騰鎮有1500多人。

貢覺頓珠引述最新消息稱，中共軍警星期五對雜多縣示威藏人採取的暴力鎮壓中，導致紮青鄉部分人嚴重受傷送醫、數人被捕，阿多鄉則傳出有一人以自殺抗議採礦。具體情況目前正在進一步核實瞭解中。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丹珍的採訪報導)

自焚女子貢確旺姆 丈夫被判死刑

西藏安多阿壩州若爾蓋縣自焚女子貢確旺姆於今年3月自焚後，中共當局立刻施用一貫伎倆以「殺妻焚屍」為理由強行拘捕了自焚女子丈夫卓瑪嘉，日前正式對這名藏人非法判處死刑。

本月15日，西藏阿壩州中共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對卓瑪嘉（又寫：卓瑪甲）非法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中共法院指出，現年33歲的卓瑪嘉與29歲的妻子貢確旺姆（又寫：廣秋俄麼）因喝酒問題發生爭執，隨後卓瑪嘉用圍巾勒死了自己的妻子後進行焚屍等。

被判死刑的藏人卓瑪嘉其後指出，他將會向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今年3月13日，西藏安多阿壩州若爾蓋縣達扎寺鎮30歲的藏人婦女貢確旺姆自焚犧牲後，遺體被若爾蓋縣公安搶走。第二天即3月14日貢確旺姆的丈夫卓瑪嘉被叫到公安局，領取骨灰。當時，中共當局要求卓瑪嘉對外宣布自己的妻子是因為家庭矛盾才自焚的，並表示不這樣說，卓瑪嘉就會有麻煩。卓瑪嘉拒絕後，立刻遭到當局的拘捕，隨後一直被關押在若爾蓋縣拘留所。

針對中共無端指控，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之前曾強調，中共對自焚無計可施，所以才編造出了這些荒誕的指稱。洛桑森格說，這些謊言無法欺騙世界民眾，但也清楚地證明了中共當局在不斷加強歪曲真相的宣傳聲勢，所以藏人們要更加的謹慎對待。

設在德國的「保護受威脅人民協會」也曾發表聲明強調，西藏境內接二連三發生多起藏人自焚事件後，中國政府一直試圖掩蓋自焚抗議者的政治動機。當局除了威脅自焚者家屬，對發生自焚事件的村莊停止財政援助外，試圖用錢收買自焚者親屬，動員他們做假證。如果自焚者親屬拒絕，就以監禁相威脅。

中共政府企圖用錢收買或以莫須有的罪名打壓自焚者家屬，不只這一次，2012年8月7日，西藏婦女卓尕措自焚犧牲後，當局利用金錢強迫他的丈夫承認是夫妻糾紛問題，但卓嘎措的丈夫因拒絕當局的收買，被拘捕。2012年10月6日，年輕藏人桑傑嘉措自焚犧牲後，當局又要求其家屬在一份關於『桑傑嘉措是因夫妻關係不和而選擇自焚』的文件上簽名，並聲稱如果簽名，將會獎勵100萬元人民幣，但同樣遭到家屬的拒絕。

位於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人民議會也一直強調，針對藏人自焚抗議事件，中共政府採取幾樣手段，其一、隱瞞和掩蓋自焚抗議；第二、金錢收買和恐嚇自焚者家屬；第三、無端指責達賴喇嘛和境外藏人策劃自焚；最後以涉嫌自焚為名非法拘押和判決無辜藏人。----VOT

道孚受槍傷藏人 增至十五人

道孚縣僧俗藏人在達賴喇嘛七十八壽辰舉行祝壽活動遭中共軍警開槍鎮壓，據證實受槍傷藏人現已增至十五人；此外，西藏昌都八宿縣仲沙寺僧人丹增赤列本月二日被控與示威事件有關遭到拘捕，但因被毆嚴重而住院至今。

甘孜州道孚縣鮮水鎮的尼措寺（中文又寫：靈雀寺）僧眾及當地藏民上週六（7月6日）聚集聖山「瑪沁本拉（音譯）」舉行煨桑祈福會為達賴喇嘛七十八壽辰進行隆重慶祝，但這一祝壽活動卻遭到中共軍警的開槍鎮壓，目前獲知受槍傷藏人已增加到十五人。

印度南部西藏甘丹寺的甘孜州道孚籍僧人亞瑪次仁星期四對本台說，截至目前有尼措寺僧人、甘丹曲林寺尼姑和當地藏民共十五人受到槍傷。「甘孜道孚縣鮮水鎮境內為達賴喇嘛尊者舉行的祝壽活動被中共軍警開槍鎮壓，但因當地的通訊管道立即被當局封鎖，無法及時獲知詳情。在事發當日，得知有七人受槍傷，星期二又得知另有三人受傷，而星期四再度瞭解到有五人當時也遭到槍擊，他們分別是尼措寺經管人次旺群培，甘丹曲林寺尼姑措列和尼姑德慶，藏民亞瑪次仁和婦女恰列，其中亞瑪次仁被槍擊後還遭到毒打，導致四根肋骨被打斷；尼姑措列被槍擊後也遭毒打，她的一隻手臂被打斷。目前大都數受傷者正在甘孜州康定縣醫院接受救治。」亞瑪次仁表示，尼措寺有兩個糾察僧官，由於當時網路等通訊管道被封鎖，因此誤以為受槍傷的是糾察師次仁頓珠，不過根據進一步瞭解得知，受槍傷的是另一位叫嘉措的糾察師，而不是次仁頓珠。

流亡印度南部的甘孜州道孚籍藏人諾布次仁星期四也告訴本台，在達賴喇嘛尊者祝壽日當天遭到當局拘捕的道孚縣僧俗藏人被證實共有十八人，他們被拘押期間遭到不同程度的毒打，其中多人被打傷。

「參加祝壽活動的藏人不僅被當局槍擊，還有十八人被拘押，後在民眾的請願下，陸續被釋放，截至7月7號中午約12點全部得以獲釋，不過因為他們遭到員警的毒打，很多人無法站立與行走，其中被打最嚴重的有甘丹曲林寺尼姑洛桑曲珍、尼姑旺青、尼措寺經管人亞瑪堅參和僧人德吉貢布。」

諾布次仁表示，其實受槍傷的藏人還不止十五人，因為不少受傷藏人害怕到醫院後被當局拘捕，所以由家人買藥後在家裡醫治，而有些人已到其他縣的醫院接受治療，因此確切的受傷人數尚且不明。此外，居住在印度德拉頓的西藏昌都八宿籍藏人索巴星期四告訴本台，西藏昌都地區八宿縣吉達鄉仲沙村的仲沙寺僧人丹增赤列被當局指控與同寺示威藏人為同夥而遭到拘捕和毒打。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丹珍的採訪報導）

香港資深大律師夏博義： 《西藏是否具有民族自決權》（摘要）

《西藏是否具有民族自決權》一文由香港資深大律師夏博義 (Paul Harris) 撰寫。中文文本由香港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邢菲、研究員蔡迪雲翻譯。

全文鏈結：<http://www.law.hku.hk/ccpl/pub/Documents/OccasionalPaperNo.18-Chinese.pdf>

大多數國家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許多國家一直掩蓋或刻意回避了它們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是「法理上的承認」還是「事實上的承認」，即承認中國對西藏具有法律上的主權還是僅僅承認中國在統治西藏這個事實。

一．何謂主權？

三百年來支撐國際法體系的是傳統的主權理論，根據這一理論國家的統治者們通過互相之間的協議來決定各自統治的領土範圍。這個通過1648年的《威斯特伐裏亞條約》得以確立的體系沒有賦予被統治者任何角色以選擇其統治者。主權若不是通過征服來確定，就是通過雙方同意的割讓來決定。西班牙根據1713年《烏德勒支條約》把米諾卡島割讓給英國的時候沒有人徵求島上居民的意見；在被法國佔領後，根據1763年《巴黎條約》再一次割讓給英國的時候，或者是根據1802年《阿敏條約》以割讓的方式重歸西班牙的時候，情況也是如此。在歐洲有許多小國，它們也曾被多個歐洲大國覬覦，而米諾卡的遭遇就是它們當中的典型代表。海外殖民地的命運也與此情況類似，它們的割讓也是完全無視當地居民的意見的。孟買在1662年成為英屬領土，它是作為查理二世的葡萄牙新娘凱瑟琳的嫁妝由葡萄牙割讓給英國的。

當代國際法儘管在一定程度上適用於世界上的每個國家，但總的來說還是一項歐洲的發明創造。特別是其中的國家主權原則更是如此，而中國正是根據這一原則主張對西藏的主權的。有一個比較具信服力的說法是，中國將這個歐洲概念用於主張對西藏的主權是扭曲了清朝皇帝和西藏達賴喇嘛之間那種保護人與宗教領袖之間的傳統歷史關係，而非統治者與臣民之間的關係。如果這種說法正確，那麼中國根據清朝與達賴之間的關係（還有近期根據更早的（元朝）蒙古皇帝和西藏之間的關係）而作出其對西藏擁有主權的所有主張都存在誤解。……無論是否誤解，這些主張在任何情況下對西藏現在是否擁有民族自決的權利都不構成影響。

二．自決：

《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二款規定在尊重民族自決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是聯合國的宗旨之

一。因此，可以說每一個批准聯合國憲章而成為聯合國成員國的國家——包括中國——已經接受了尊重民族自決的原則。

在《聯合國憲章》之後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規定了一系列權利，這些權利在兩個更加具體的公約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闡述。這兩個公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公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第一條都規定：“所有民族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

中國在2001年3月批准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而且就該公約適用於中國大陸來講，對其第一條未進行任何保留。

因此，出於對《聯合國憲章》的遵守，並作為《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簽署國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成員國，中國有義務尊重民族自決的原則。

三．民族自決權的實質內涵是什麼？

殖民地的自決的問題在聯合國大會《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宣言》（1960年12月14日通過的聯大1514號決議）中得到了考慮。該宣言的第一條規定“各民族之受異族奴役、統治與剝削，乃係否定基本人權，違反聯合國憲章，且係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之障礙”。聯大後來在1970殖民地的自決的問題在聯合國大會《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宣言》（1960年12月14日通過的聯大年又通過另一決議《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這一決議重申“異族奴役、統治和剝削違反了（自決）原則”，并且是“對基本人權的否定以及違反《（聯合國）憲章》”。

異族奴役、統治和剝削違反了一民族的自決權，已經被強烈主張為構成習慣國際法的一部分，即不是通過條約，而是通過國家之間的習慣而確立的國際法。

四．中國與西藏的歷史關係

中國目前對西藏的控制始於1950年人民解放軍入侵西藏並於昌都擊敗西藏軍隊。中國主張在其入侵西藏之時，西藏已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一主張是基於始於18世紀清朝對西藏的主權。近期中國更主張對西藏的統治可以追溯至蒙古人對西藏的統治，即中國的元朝。從歷史角度而言，中國的主張存在三個問題：

首先，正如上文已經指出，清朝和元朝的統治者與西藏之間的關係是否是統治者與臣民之間的關係存在疑問。康熙皇帝在1720年佔領了西藏，在他於1722年去世之後，他的繼承人雍正皇帝繼續佔領西藏直至1728年。後來在1750年和1792年中國再次入侵西藏。然而，在1728年的佔領結束後，以及在其後的每次入侵之後，中國軍隊都撤出了西藏，而西藏事實上是完全獨立的。

第二點，兩個朝代中都沒有宣稱過這種佔領關係使得西藏成為中國本土的一部分。如果這能算得上是一種政治關係，那麼只是一種附屬關係，即現代語言的殖民關係。以此為基礎，就可以做出西藏是一個殖民地的結論，而西藏亦因此應有自決的權利。

即使從歷史角度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的主張比實際情況更強，也不能作為入侵一個獨立國家的依據。許多國家都曾在某時期內被異族統治。愛爾蘭在若干世紀前都處於英國統治之下，直到1911年也是如此；芬蘭曾被俄國統治；朝鮮曾被日本統治。聯合國成立的明確目的，就是防止類似的侵略戰爭；發動這類戰爭的原因往往是基於虛假或存疑的歷史統治或文化身份等主張之上，就像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主義曾經採取的手法一樣。

中國經常以西藏社會封建落後，中國要將西藏農奴從封建統治中解放出來作為其入侵的西藏的依據。

學者們同意1950年之前的西藏是封建落後的，它的落後之處之一，就是未能向其他國家派遣大使或在中國入侵前申請加入聯合國。然而，這個不足不是由於西藏的獨立性不夠而導致的，而是因為西藏政府的極度的傳統和封閉使其未能清楚瞭解現代國家需要與其他國家保持關係這一概念。

儘管這樣說可能只是重複顯而易見的事實，我還是要指出一個國家的落後不能作為被侵略的理由。“落後”經常被用來作為十九世紀殖民主義的依據，當吉卜林（Kipling）鼓勵美國將所謂落後的菲律賓殖民化時就說這是“白人的責任”。中國經常以「落後」這一論據來支持其佔領西藏，也是進一步說明那是一個典型的殖民主義佔領。

五. 1950年之後的中藏關係

中國在西藏的所有嚴酷鎮壓行動都被完備地紀錄。藏傳佛教受到了嚴酷鎮壓，更於1997年被稱為“外來文化”。

西藏中、高等教育的所有班級都用漢語而非藏語教學，造成了藏人的高輟學率。城市的發展普遍造福了中國移民，他們大量遷移至西藏，現在已構成西藏自治區人口的12%。藏人常會未被起訴就被長期羈押，或因為和平主張西藏獨立或與達賴喇嘛保持聯繫而被判以長期監禁；監禁中的酷刑和虐待也很普遍。藏人的言論自由亦

受到了嚴格限制。和平政治示威總是遭到驅散，其參與者更會被捕。藏族文化的待遇低於中國文化，而且政府的主要職位都由中國人擔任，經濟也由中國人控制。能夠進入中國政府任職的少數藏人，他們付出的代價是要疏遠其本身的人民和文化。西藏的環境和自然資源為中國的利益而被無情剝削。

六. 自決的案例

沒有人會否認藏人是一個擁有自己語言和文化的獨立民族，他們構成了西藏人口的絕大多數，卻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中國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用軍事佔領的方式控制西藏。西藏是一個處於外來軍事統治下的國家，根據聯合國《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宣言》和《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西藏人民處於“異族奴役、統治和剝削”之下。

藏人在中國統治下遭受的鎮壓之嚴酷，以及中國對西藏領土主張之薄弱，都意味著若民族自決這一權利還有任何意義的話，則必須適用於西藏。

在塞爾維亞還是南斯拉夫聯邦的一個共和國之時，科索沃是塞爾維亞內的一個自治區……1996年，阿爾巴尼亞人起義，反抗塞爾維亞人的統治並爆發了遊擊戰。1999年，由於北約的空襲，塞爾維亞軍隊撤出科索沃，而聯合國則在當地建立了政府機構。根據聯合國特別代表 Martti Ahtisaari 的建議，一個為實現科索沃獨立的計劃書得以起草。雖然這一計劃書受到了塞爾維亞的強烈反對，但是科索沃還是在2008年2月17日宣佈了獨立。自宣佈獨立到現在為止，科索沃的獨立已經得到了43個國家的承認，包括所有七大工業國國家的承認，但還未得到俄羅斯、中國和西班牙這些國內也存在分裂問題的國家的承認。

科索沃從來就不是一個殖民地，而且塞族軍隊在獨立問題決定之前就撤出了科索沃。承認科索沃人民以建立獨立國家的方式行使自決權的唯一合理的法律依據就是，在其獨立之前，當科索沃還處於塞爾維亞統治之下時，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受到了“異族奴役、統治和剝削”。這裏的奴役者、統治者和剝削者，儘管一直也是同一國家的人民，但在文化上是不同的，所以也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異族。

如果科索沃有民族自決權，那麼西藏的便應有更強的民族自決權。一連串的嚴酷鎮壓、中國統治下藏人的二等公民身份，以及西藏作為一個國家的地位，都比科索沃的情況更明確。

夏博義撰寫。夏博義是香港的資深大律師。他的職業生涯始於在英國內務部擔任公務員。在英國海外發展局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夏博義在倫敦取得執業大律師資格，並成為英格蘭及威爾士大律師公會的人權委員會的創會主席。夏博義還在馬拉維、哥倫比亞、尼泊爾和東帝汶等多個國家從事人權工作。夏博義也是《示威的權利》這一書的作者。

我參加落實民族政策的經歷 (全文)

尹曙生

1961年7月11日至8月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蘭州召開了第一次民族工作會議。會議“著重地討論了一九五八年以來西北的牧區工作和牧區人民公社工作，同時，也認真地檢查了一九五八年以來，貫徹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情況，初步總結了這一方面的主要經驗，研究了改進工作的方針和辦法”（《紀要》原文）。會議通過了《第一次西北民族工作會議紀要》，並上報中共中央。同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轉了會議紀要（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

這個《紀要》是在“左”傾思想指導下，以“大躍進”和階級鬥爭的觀點，充分肯定1958年以來西北牧區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取得的偉大成就；充分肯定在牧區全面推行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偉大、正確（見《紀要》原文），同時也不得不承認在牧區工作中“許多地方忽視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民族問題，不認真貫徹執行甚至違背黨的民族政策。最突出、最嚴重的是青、甘藏區（主要是牧區）的問題”；“目前在一部分地區，災情特別嚴重，群眾生活異常困難……必須全力以赴，救災救人”；過去三年“有一些同志不以平等態度對待少數民族，不關心少數民族的疾苦，侵犯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利，強迫改革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不信任和歧視少數民族”；“近兩、三年來，在青、甘藏區和其他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工作中存在許多問題，犯了嚴重錯誤，遭受了重大損失，造成了很大困難”。會議紀要決定放寬政策，恢復和發展牧業生產，改善牧民生活，並做了許多具體規定；調整民族宗教政策，開放被強行關閉的部分寺院，允許信教群眾進行宗教活動；在一定範圍內糾正平叛、鎮反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堅決實行‘四不’政策，凡是（叛亂）來降的，不論罪惡大小，一律不殺、不關、不判、不鬥”；“不要在社會上亂戴‘叛亂家屬’的帽子，以利爭取和分化敵人”；不得“強迫改革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對於犯有嚴重錯誤，屢教不改的幹部，要給與適當處分，以資教育”；平反冤假錯案，當務之急是立即釋放那些還被無辜關押在看守所裏的人犯。《紀要》明確要求：“錯捕了的要釋放，錯戴叛亂帽子的要摘掉；已經死亡的也要恢復名譽，摘掉帽子。要根據劃清界限，從寬處理的精神，繼續清理釋放一批在押人犯，以分化瓦解敵人，安定社會秩序”。（以上引文都來自《紀要》）

中共中央在批語中說：“《西北地區第一次民族工作會議紀要》很好，中央同意這個紀要中擬定的方針和辦法，請西北局發各級黨委貫徹執行”；“西北的經驗，首先是青、甘藏區的經驗再一次證明，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忽視民族問題是毫無根據的錯誤的。有的地方不認真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甚至在工作中違反這些政策，更會給工作造成損失”；“在我國各民族共同的社會主義事業中民族問題這一重要因素決不允許忽視，如果忽視這個問題，不做好少數民族工作，在工作中不堅決地按照民族政策辦事，就會使我們犯錯誤”。

中央批語雖然指出西北地區牧區1958年到1960年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忽視民族問題，不認真執行黨的民族政策，犯了錯誤，造成了損失，但是沒有指出這些錯誤是在“三面紅旗”的指引下，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不問少數民族地區的特點，

要求將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步並作一步走，使牧業區和農業區一樣，在兩三年內過渡到共產主義，這才是錯誤發生的根本原因。因為當時中央仍然堅信“三面紅旗”偉大正確，所以不可能指出發生問題的根本原因何在。而西北地區不僅僅是牧區，農業區在“大躍進”年代同樣遭到劫難，人民群眾同樣死傷慘重，其損失絕不亞於牧區。

青海和甘肅是西北地區貫徹執行《紀要》的兩個重點省，而這兩個省的牧區又是貫徹執行的重點地區。

青海省牧區有六個州，即玉樹、果洛、海南、黃南、海北、海西，其土地面積約佔全省土地面積85%，是以藏族為主的少數民族地區，當時藏族人口約47萬多人，約佔全省總人口244萬的19.6%，占牧區總人口95萬的49%。除海西、海北兩個州沒有發生叛亂外，其他四個州，即玉樹、果洛、海南、黃南四個州從1958年春開始發生叛亂，到1959年被基本平息。然而在整個青海省，無論是農業區還是牧業區，無論是發生過叛亂的地方還是沒有發生過叛亂的地方，由於以高鋒為首的青海省委，以極“左”的專政手段推行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提出在青海“將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步並作一步走，在兩、三年時間內，徹底完成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完成牧業社會主義改造”，結果造成全省工農牧業生產遭到極大破壞，幾十萬人被餓死、整死，需要平反的冤假錯案很多，需要釋放的無罪人員很多。我在《炎黃春秋》發表的幾篇文章中做了些介紹，但著重談的是農業區情況，對牧業區情況，著墨較少，不少讀者來信來電話，希望我對牧業區情況作些介紹。本文就青海省牧區貫徹執行《第一次西北民族工作會議紀要》，糾正政法、公安工作極“左”路線、釋放無罪被關押人員情況，再做些介紹。

1958年至1960年青海省公安機關在“公安工作大躍進”口號指引下，為推動“大躍進”運動的順利進行，任意捕捉那些反對、抵制的人和潛在反對、抵制的人，三年共逮捕63064人，拘留6157人，判管制9918人，集訓39419人，共計108558，佔全省總人口244萬的4.4%。其中在牧區共逮捕44532人，占牧區總人口95萬的4.66%；農業區和西寧市共逮捕18263人，占總人口153萬的1.2%。牧業區捕人比例大大高於農業區。

再看看牧區四個發生過叛亂的州的捕人統計數字：玉樹州1958年至1960年（下同）共逮捕15402人，占三年該州平均人口100535人的15.3%；果洛州逮捕6593人，占三年平均人口75176人的8.77%；海南州共逮捕9682人，占三年平均人口202552人的4.78%；黃南州逮捕7866人，占三年平均人口148977的5.28%。

下面舉幾個典型例子。玉樹州玉樹縣紅旗公社新寨生產隊，三年共逮捕176人，占人口總數的36.3%；海南州貴南縣嘛多公社，共有697戶人家，1360名成年人，被逮捕關押404人，占總人口的16.7%，占成年人口的29.4%，涉及292戶人家，占總戶數的41%；其中一戶捕一人的有228戶，一戶捕二人以上的有70戶，有4戶全家捕光。海南州興海縣夏塘公社沙乃亥生產隊，共有41戶105人，共劃“四類分子”和“反革命社會基礎”91人，占總人口的86.4%；玉樹州的一些地方，成年男性被捕光，以致公安機關去捕人時，當地群眾要求“留下人種”。

以宗教改革的名義，幹涉宗教信仰自由，大量寺廟被解體，

宗教人員被還俗。“從1958年8月開始，到11月底統計，全省859座喇嘛寺廟，有731座解體；54281名宗教人員，有24613名還俗參加生產”（見青海省代表杜華安，在1958年12月18日於北京召開的第11次全國統戰部長會議上的發言。見《民族工作文件匯編》第2輯）。

全省共有以民族、宗教上層人物為主的統戰對象2290名，被逮捕、法辦的1572人，占69%。海南州有統戰對象257名，逮捕227名，占87%；沒有發生叛亂的海西州，有統戰對象69名，被逮捕58名，占86%；玉樹州昂謙縣有統戰對象52人，除7人外逃，其餘45人全部被逮捕。

那麼逮捕這些人對不對呢？截止到1961年10月，玉樹州根據省委的要求進行整風，自查自糾，第一批復查了2524個被捕的人，認為捕錯了的2246人，占被捕人總數的89.2%，認為基本正確的203人，占8%，其他75人是可捕可不捕的（按中央規定：可捕可不捕的，捕了就是犯錯誤——筆者註）。海南州第一批復查了794人，錯的494人，占62.1%，由於是自查自糾，不可能準確，省委工作組到海南州進行抽查，結果捕、判正確的，不到2%。黃南州澤庫縣1958年逮捕的517人，省委檢查組去檢查，發現有465人沒有任何檔案材料，有材料的只有52人，而有材料的人，材料字數最多的不超過100個字，有的只有幾個字，比如犯罪嫌疑人姓名之後寫著：“叛匪”“壞蛋”“思想反動”等等，沒有具體罪行。該州被逮捕的人，90%以上都是不應該逮捕的。

被拘、捕的人，由於受到刑訊逼供和饑餓的折磨，大量死亡。玉樹州看守所三年死亡在押人員4219人，占在押總人數7501人的56.2%；死亡集訓人員1641人，占集訓人員總數3354人的48.5%；黃南州公安處看守所僅1960年死亡在押人員212人，占當年在押人員385人的55.1%。果洛州1960年死亡集訓人員698人，占總集訓人員2251人的24%。

以上這些具體數據都是各地在整風中自查自糾統計出來的，重點地區還經過省復查小組核實無誤，是準確、可靠的，只少不多。

亂戴“四類分子”“叛匪”帽子。三年中全省戴“反動分子”“壞分子”帽子的3.4萬人，另有74091人被劃為“反革命社會基礎”，兩項合計10.8萬人，占總人口的4.4%。

那些還被關押在看守所、集訓隊裏的人，到了1961年夏、秋，每天都還有人死亡，所以《紀要》要求以“從寬處理精神，繼續清理釋放一批在押人犯”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人命關天，不得不這樣做。根據《紀要》的要求，迅速釋放無罪在押人員就成了當務之急，重中之重，所以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西北各省尤其是捕人最多的青海、甘肅省委高度重視，立即行動，不得有誤，並派出檢查組到甘肅、青海督促檢查。於是，西北局第一個檢查組一行三人，於1961年12月9日到達青海。青海省委辦公廳和省委政法組各派一人，省公安廳派一人，和西北局3人共6人組成聯合檢查組到玉樹、果洛兩個重點州去實地檢查督促釋放無罪在押人員情況。

筆者參加工作時間不長，沒有工作經驗，被指派參加檢查組，誠惶誠恐。但是，聽了聯合檢查組組長——中共西北局政法組組長張之軒的話，我就不擔心了。他說，“臨走前，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交代我們，你們此行任務很簡單：就是督促放人，不能再讓無罪的人死在看守所、監獄裏。所以我們到這兩個州去檢查，程序簡單，就是到這兩個州公安機關看守所、拘留所去實地查看還關了多少人？為什麼不釋放？回答不出來的，就叫他們放人；誰頂著不辦的，人在看守所、拘留所死亡的，就要他負責任”。

檢查組12月12日從西寧出發，第一站到玉樹州。車行至果洛州瑪多縣的花石峽，由於小雪路滑，只好在那裏過夜。除兩輛

吉普車司機外，檢查組6人全部出現高原反應，嘔吐、頭痛。兵站站長（當地沒有旅館，我們住在兵站）告訴我們，花石峽在這一帶氣候最惡劣，你們沒有在高原生活過的人，不應該在這裏住宿；玉樹州結古鎮海拔比這裏低，到那裏你們就沒事了。第二天凌晨，我們吃了兵站準備的半生不熟的面條（高原，水溫不到90攝氏度就開了），匆匆上路。下午到達玉樹州首府結古鎮。經過醫生治療，晚上睡了個好覺，我們6個人才逐步恢復正常狀態。

玉樹州委政法領導小組和公安處負責人向檢察組匯報了貫徹執行西北局第一次民族工作會議紀要精神（《紀要》在中央沒有轉發前，由於形勢緊迫，青海省委以電報形式發各個州、縣委，貫徹執行）情況，尤其是中共青海省委於8月23日發出的《無條件釋放在押無罪人員的緊急通知》後，全州已經釋放713名在押人員，州看守所目前只剩下12名在押人員，都是因為現行刑事犯罪而被關押；現在全州6個縣在押人員不到100人，有兩個縣看守所沒有在押人員。聽了匯報，在範處長帶領下，檢查組到州看守所實地察看，確實只有12名在押人員，經了解其中有5人因為饑餓而偷宰生產隊牛1頭、羊4只，偷盜酥油3斤，證據確鑿，本人供認不諱。檢查組討論後認為，他們是在吃不飽飯、生活極端困難情況下幹的，罪行輕微，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況且他們都有病（饑餓造成），不釋放就有可能死在看守所，應立即釋放。州公安處處長當即命令看守所所長放人，並指示在釋放前讓他們吃頓飽飯，負責送到家。還有7人因搶劫、鬥毆致傷致殘他人，後果比較嚴重，沒有立即釋放，等待法院判決；但是檢查組要看守所想辦法讓他們吃飽飯，有病的進行治療，逐步恢復健康，實在不行的，保外就醫，總的要求是不能讓他們死在看守所。玉樹縣看守所也在結古鎮，已經沒有在押人員，檢查組沒有去檢查，但是範處長還是不放心，要我單獨去看一下，我隨縣公安局局長到看守所察看，確實沒有在押人員。

我們只用了一天多時間就完成了玉樹州、玉樹縣的檢查，比想象的要順利得多。當晚，州委書記沈××要請檢查組吃飯，被張之軒組長婉拒。因為在西寧他聽了省公安廳和省委政法小組匯報，玉樹州這幾年捕人這麼多，和這位書記堅決執行“左”傾路線有關。1958年、1959年在他的高壓下該州公安機關濫捕濫抓人，且大量死在看守所、拘留所、集訓隊，報告送給他，身為州委書記，他置若罔聞；到了1960年4月，他仍不接受教訓，不釋放被抓捕的人，還繼續下令抓人，當州政法小組根據省裏下達的捕人指標任務，提出全州全年計劃逮捕1500-2000人，計劃報上來時，他大筆一揮改為5000-7000人，並批示說：“你們可不受此數字限制”；該州昂謙縣1960年計劃捕人170人，他批示“太右傾”，結果全年逮捕了760人，幾乎全是錯捕。

檢查組看到玉樹州公安機關貫徹《紀要》立即釋放被關押無罪人員的態度比較端正，措施比較得力，效果比較顯著，原打算到該州其他幾個縣察看的計劃取消了，經商量，直接到捕人比例最多、人民來信最多的果洛州久治縣實地察看。經過三天的艱苦跋涉，我們來到和四川阿壩州接壤的果洛州久治縣。

這個在1958年只有5918人的小縣，三年中被逮捕1540人，占總人口的27%。其中死在監獄、看守所的848人，死亡率高達57%。根據《第一次西北民族工作會議紀要》精神，無罪被關押需要立即釋放的就有862人。可是大多數人已經死在看守所或勞改隊，實際被釋放的只有437人，到12月23日，全部釋放。1961年12月19日，為落實省委“無條件釋放在押無罪人員的緊急通知”精神，該縣康賽爾公社（捕人比例最高的公社）通知被捕人員家屬說，今天州公安處將該公社被捕人員全部釋放，要家屬到公社迎接親人。所以被捕人員親屬早早來到公社，接親人

回家。可是當州公安處載人的大卡車到達時，從車上下來的在押人員只有27人，還有157名在押人員被告之已經在勞改農場和看守所死亡時，沒有接到親人的家屬，當場放聲大哭。當晚這些人在家中點上酥油燈，祈禱亡人。檢查組全體人員到康賽爾公社親眼目睹了這悲慘的一幕。檢查工作結束後，檢查組在給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寫的報告中有一節的標題是：“接親人被告之已經死亡，在家中點酥油燈祈禱亡人”。人死在勞改農場、工廠、看守所、拘留所、集訓隊、勞教所，開始還通知家屬，以後人死多了，基本上不通知家屬，而他們的家屬、親人還在不斷寫信，囑咐他們“好好接受改造，爭取早日釋放，回家團聚”。

這個縣情況如此嚴重，一個重要原因，是該縣以縣委書記郭××為首的縣委推行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進行所謂宗教改革，執行“左”傾路線到了瘋狂的程度。他不斷指示公安機關抓人、抓人、再抓人。他說：“把壞人抓完了，我們的工作就好做了。”公安局人少，抽不出人下鄉捕人，他就要公社對那些反對公社化、反對將牛羊無條件沒收歸公社所有、反對吃食堂的人，“私通叛匪”的人和小偷小摸的人，進行正常宗教活動的人，統統抓起來，沒有人押送，怎麼辦？他出主意說：“叫他們自投羅網，找借口要他們給公社送信到公安局，給他記工分，在信上寫著‘見信捕人’幾個字，到了公安局就把他扣下關起來。”採取他設計的這種辦法公安局就逮捕了76人。檢查組到縣公安局看守所看到一個名叫洛爾加的在押人員，問公安局長此人犯何罪，為什麼不放？局長說不知道他怎麼被關進來的，我們準備明天就放他。張之軒問洛爾加，你為什麼被關在這裏？他說，去年8月，公社叫我給食堂送牛糞，我去遲了，社長叫我給公社送信到公安局，信送到後，公安局把我扣下，不讓回去。問他信送給誰了，他說是公安局的趙秘書。我們找到趙秘書，他說他記不得了。我們要他打開辦公桌抽屜，找到了那封“見信捕人”的條子。同時找到5張同樣的條子。通過這5張條子，查找到該縣白玉公社三大隊一個名叫鄧山的人，因為偷了公社食堂一副羊下水，公社決定逮捕他，對他說，你把這封信送到公安局，就不追究你偷盜的事。鄧山因為孩子病了，自己無法到縣裏去，只好要他的好朋友周樸加代替他送信。周樸加到縣公安局，將信交給趙秘書，趙秘書見信上寫著“見信捕人”幾個字，將他關到看守所裏。周樸加反復說他是替鄧山送信，趙秘書沒有理他，結果三個月不到，死在看守所。張之軒問趙秘書：被你關押起來的這些人，你問過他們都犯了什麼罪嗎？答：我只要看到“見信捕人”幾個字，就把他關起來，至於他有罪沒罪不是我的事，那是預審員的事。我是在執行領導指示。

郭書記不僅指示公安機關濫抓濫捕無辜群眾，自己也身體力行，他親自批示逮捕的就有幾十人。

1960年3月21日，縣委召開縣直機關幹部大會，郭書記在會上批評縣直機關幹部精神萎靡不振，消極怠工，對克服暫時困難信心不足；自由主義思想嚴重，隨意議論、誹謗領導，挑撥同誌之間關係。……郭書記越說越激動，突然使勁拍了一下桌子，站起來，大聲喊道（真名、真姓、真實場景——筆者註）：公安局長陳希貴來了嗎？陳希貴嚇了一跳，迅速站起來，忐忑不安地回答道：郭書記，我在這裏。

郭書記說：我們縣委機關有的幹部思想作風不正，自由主義思想嚴重，必須嚴厲懲處，才能刹住這股歪風，像縣委宣傳部的王萬成就是這樣的人。現在我命令你馬上把他抓起來！

王萬成不知所措，驚恐萬狀。陳希貴來到他跟前，對他說：你都聽到了吧？請跟我走！

王萬成站起來對郭說：郭書記，我冤枉啊！

郭書記大聲呵斥：你冤枉？我才冤枉呢！陳希貴，把他帶走！

就這樣，王萬成被關進了縣公安局看守所，直到省委緊急通知下達，才被釋放。

王萬成被關在看守所一年多時間，沒有被提審過，因為公安局也不知道他犯了何罪，又不敢問郭書記。

王萬成被釋放後回到宣傳部，向同事打聽自己為啥被捕。一位同事告訴他，你是不是說過，郭書記文化水平太低，把忠心耿耿為人民服務，念成中心耳火耳火為人民服務？

王萬成恍然大悟。他確實說過此話，被人打小報告給郭書記。他自認倒黴。

一次郭書記到縣牧場視察，廠長招待喝酥油奶茶。他將自己騎的馬交給牧工曲乎介牽去餵飼料。餵好後，曲乎介感到郭書記的馬膘肥體壯，在好奇心的驅使下騎上馬，學著郭書記騎馬的模樣，被郭看見，喝令他下馬，斥責曲乎介冒充縣委領導，招搖撞騙，當即命令隨他同到牧場的公安局長陳希貴將他捆起來，騎馬牽著他到公安局，關進看守所，罪名是“冒充縣委領導，招搖撞騙”。後被法院判三年徒刑。

縣公安局看守所根據郭書記的指示逮捕的兩個叛亂歸降人員，被刑訊逼供，奄奄一息。陳希貴向他報告說這兩個人有病，快要死了，公安局準備釋放。郭書記說：放回去他要叛亂怎麼辦？不如把他勒死算了。結果這兩個人被民警用繩索活活勒死。

1960年4月，郭書記有病住縣醫院，要護士肖××給他按摩，要她給他手淫，她非常害怕，但是又不能拒絕；她將此事告訴自己的好朋友，尋求擺脫的辦法，誰知被傳出去。郭書記惱羞成怒，說她“侮辱領導，血口噴人”，將她開除公職、開除團籍，勞動教養2年。

以郭××為首的久治縣委，在人口極端稀少、居住十分分散、純少數民族地區，不管青紅皂白，竭盡全力推行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完全忽視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和特點，盲目蠻幹，到了瘋狂的地步。1958年9月5日全縣強行建立175個牧業生產合作社；為了向共產主義過渡，到10月10日又將175個牧業生產合作社合並成立6個人民公社，強令全縣牧民1587戶、5123人全部加入人民公社，將牧民私有牲畜79092頭非法無償剝奪，成為公社集體財產，到1961年牲畜減少近一半，牧民生活陷入絕境，不得不靠挖野菜、蕨麻和打獵維持生命。1959年4月，全縣強迫辦公食堂104所。牧民居住十分分散，多是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沒有固定地址，強迫吃食堂後，有的牧民為了吃頓飯，不得不騎馬跑幾十公裏。他下令將全縣12座寺院關閉，將喇嘛趕出去開荒種地，還從河南省引進2000多人移民辦農場，到1960年，全縣開荒112477畝，實際播種53950畝，其中種糧食48950畝，1960年糧食總產量16.85萬斤，平均畝產3.44公斤，連種子也不夠，而久治縣草原遭到嚴重破壞，很多開荒種糧的人慘死在草原，包括1000多個河南移民。

檢查組離開久治縣不久，郭××被撤銷縣委書記職務。到1962年春、夏，青海牧區的州、縣委主要領導和政法機關尤其是公安機關領導，大多數被撤銷職務，有的受到黨紀、政紀和司法處分，大批冤假錯案得到平反昭雪，被關押的無辜人員，包括在農場勞改的1.8萬多人得到釋放。這是貫徹執行《紀要》的主要成績之一，值得記載。

（作者為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曾在青海省公安廳工作）

（責任編輯 楊繼繩）
《炎黃春秋》2013年第7期

中共對藏政策動向

桑傑嘉

2008年，西藏全區發生抗議中共殖民統治運動後，中共採取更殘暴的鎮壓政策，西藏境內人權狀況一度惡化，加之鐵腕統治進一步的加強，西藏境內抗議中國政府的事件連續不斷，並導致藏人以自焚的方式進行抗爭。08年前後，雖然，達賴喇嘛尊者的特使和中國政府進行了多次的會談，但是，西藏境內的人權狀況還是直線下滑，軍事化管理寺院、限制藏人自由行動、監控藏人、民族隔離、「再現文革」等等，再次橫掃整個西藏，迫使120多名藏人自焚，如此慘烈的抗議震驚了世界，雪域高原沉浸在萬分悲痛之中。

但是，6月一連串的事情，外界對中共對藏政策進行了眾多的猜測，國際媒體紛紛進行評論、分析。這一波討論是由：《亞洲週刊》第27卷 22期刊登了《中共中央黨校社科教研部靳薇教授：重啟談判解決涉藏問題》的文章、青海省高層與學者召開會議提出所謂的「三改變」：「第一，各寺院和個人可以自由供奉達賴喇嘛法相；第二，不許誣衊和指示他人謾罵達賴喇嘛；第三若在寺院中發生重大事件，先由寺院領導和高僧等進行內部調節，軍警不會立刻進入寺院採取壓制等措施。」這些是美國大使駱家輝突然訪問西藏等引起的。

其中，引起國際媒體特別關注的是《亞洲週刊》第27卷 22期刊登了《中共中央黨校社科教研部靳薇教授：重啟談判解決涉藏問題》，首先是靳薇特殊的身份「中共中央黨校社科教研部教授」，因此，外界普遍認為她是體制內的人，特別是來自「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直接領導下的培養中國共產黨的高、中級領導幹部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幹部」的「中共中央黨校」，更能代表中共官方。

另外，這位中共中央黨校社科教研部靳薇教授提出與政府現今對藏政策相反的觀點：「重啟談判解決涉藏問題」。而且，她公開承認西藏存在的一些現實問題，中共從來不公開承認這些問題。（雖然，她的最終目的是「力爭只產生國內達賴喇嘛靈童」）所以，引起了外界媒體的關注，開始認為中共對藏政策有所松解。

不僅僅是國際媒體，在流亡藏人中也開始議論靳薇言論，而且，有一部分人對此表現樂觀的態度，認為這是中共高層釋放的資訊。如果沒有中國政府高層點頭，她不可能自作主張的發表這樣的言論。加上之後，「各寺院和個人可以自由供奉達賴喇嘛法相」之說，對中共有意改善西藏問題僵持局面深信不疑，持自己觀點。事實上靳薇說了幾句實話而已，由於中共一直說謊、顛倒黑白、歪曲事實---中共體制內說句實話已經是「奇跡」。

對靳薇專訪當時有很多評論，其中西藏著名作家唯色最早發表評論，她在《「力爭只產生國內達賴喇嘛靈童」的意思是什麼？》一針見血的指出：「怎麼感覺是某個棋局正在一步步走呢？到底要怎麼個「力爭」？中央黨校教授口中的「我們」是誰？中共會不會在佈局？很用心的、很遠慮的，布一個很大的局呢？這裡貌似出現了很多各種身份的人。白臉紅臉。甜言蜜語。甚至在打悲情牌。而他們用「重啟談判」做誘餌，用訪問香港弘法做誘餌，包括最近新華社報導中共投入250萬元修繕尊者達賴喇嘛故居（位於青海省海東地區平安縣石灰窯鄉紅崖村），他們的目的，是不是就想讓尊者最終承諾轉世到「國內」？——正如黨校教授所說的：「力爭只產生國內達賴喇嘛

靈童。」而且，她還在最後提出警示：「是啊，險地不赴！當有人力爭只產生國內達賴喇嘛靈童」之時，惟願尊者平安，尊者無恙！」

另外，中國學者胡平先生也《解讀靳薇教授講話》，他在文章中稱：「那些涉藏的中共官員，學者，只要他／她還良心未泯，面對當前西藏的現狀，他／她不能不感到不安，不能不感到焦慮。」

其中必定會有一些人力圖公開講出自己的不同意見。他們需要表明他們並不認同當局的做法，他們希望當局改弦更張。他們也許知道他們無力改變現狀，但是他們至少想表明：我們和他們不是一夥的，我們和他們還不一樣。」

胡平先生還說：「靳薇教授主張力爭只產生國內達賴喇嘛靈童」，無非是當局歷來的如意算盤，而她所說的用『金瓶掣籤限制靈童產生於國外，也無非是當局一向的策略。值得關注的是，靳薇教授還講了一句話。靳薇教授說『但歷史上也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傳統』。這句話非同小可。這句話非常重要。歷史上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傳統，這是個事實的問題，不是觀點的問題。」

還有，在西方世界也對這次專訪非常關注，著名雜誌《經濟學人》也刊登了有關評論靳薇言論的兩篇文章，其基本觀點也認為中共有意改善對西藏問題的態度。

本人對待「靳薇專訪」持謹慎態度，因為，從西藏境內現實情況和中共高層執政方式、中共高層人事構成、以及中共西藏政策制定過程等角度看，不可能對西藏政策進行調整，北京政府繼續將會執行在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制定的政策。

另外，靳薇口出重啟對話解決西藏問題等等，不覺得是一個爆炸式的消息。因為，中共體制內的知識份子生活在雙面人的世界裡，他們在不同的場合會說不同的話，中國體制已經把他們訓練成有這種生存技能的人。所謂的學者、知識份子面對學術界或者知識界時一種觀點，面對政治人物和政治化的場合又是完全不同的立場、觀點。

如在中國大陸的學者、知識份子等在學術圈、學術研討會等場合，絕對不會說「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因為非常清楚口出此言，等於是自己出醜。但是，在表明政治立場時他們毫不猶豫，滔滔不絕、振振有詞地高呼「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其它知識份子也對此表示沉默，見怪不怪。他們認為這是組織上的安排、是「鬥爭」的需要。

靳薇作為發表專著十餘部、論文百餘篇的研究者，加上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及博士後導師、民族宗教理論室主任等桂冠，在接受中國大陸之外刊物採訪時，不可能重複中共那些政治口號。所以，以「研究者」的身份發表言論，畢竟她還是：「主要研究領域是西藏問題，側重四九年後的西藏政策。」，更是馬戎親傳弟子。不說說有點新意的內容，不扮演開明的角色會很失身份的。因此，專訪中的內容讓媒體產生興趣是很自然的。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媒體就在靳薇言論議論紛紛時，中共官方網中國西藏網刊登了，中共前統戰部部長朱維群的《達賴曾反復表示不會叫停自焚》和他在前幾年發表之後引起爭論的文章《對當前民族領域問題的幾點思考》，而且，最近再次發表狂言說：「近來，『中間道路』再次成為達賴集團和一些西方

人熱炒的話題，而境內也有人公開半公開製造輿論，仿佛中國政府只有接受『中間道路』，『中間道路』才可能解決。」。

在西藏發生的另外一件事：西藏著名作家唯色是這樣寫的：「微博微信上許多藏人以奔相走告的熱情傳播這個消息：『最近中國政府對藏政策調整引起世界的關注：第一，各寺院可以自由供奉達賴喇嘛法相；第二，不許誣衊和指示他人謾罵達賴喇嘛；第三若在寺院中發生重大事件，先由寺院領導和高僧等進行內部調節，軍警不會立刻進入寺院採取壓制等措施。』」

當時，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的聲明說，對達賴喇嘛的政策是「一貫而明確的」，沒有發生任何改變。但是，這一事件還是在流亡社會引起了很大的影響，大家紛紛討論，媒體爭先恐後的報導。就在抄的火熱時，中共軍警在西藏康區掃射出席達賴喇嘛誕辰祈福的藏人，其中十五名西藏民眾中彈，至少抓捕了二十多人，以及之後俞正聲在甘南的發言真是當頭一棒。

此外，7月15日，中共海南州政協就俞正聲在西藏甘南州發表的講話內容召開專題學習會。會上，海南州政協副主席、州佛教協會會長嘉薩倉·洛賽尖措表示：「我在赴貴南、同德和興海三縣開展藏區和諧穩定宣傳教育活動中，由於對全省藏區維穩工作座談會和全省藏區和諧穩定宣傳教育工作會議精神領會的不夠全面，尤其在對達賴集團的政策方面，講解的不夠全面準確，誤導了社會輿論，造成了負面影響。對此，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而黃南州也不敢落後，最近展開「黃南州大力開展文化市場整治行動」，稱「……集中檢查清理公共場所懸掛、出售達賴畫像及傳播謠言等」。真相已經水落石出了。

媒體關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近日在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調研時的講話原因與以上提到的媒體猜測中共對藏政策調整而來的。他這次的講話本身沒有任何的新意，只是重複中共的陳詞濫調，只不過再次想強調對西藏的強硬政策。

中共對藏政策是否有改善的可能性？是大家最關心的事。從中共習政府執政方式等看，中共調整西藏政策的可能性非常之渺小。中共將對西藏繼續進行強硬的殖民統治和拖延政策，這在短期內是無法改變的。這從中共高級西藏問題顧問，吃西藏問題飯的御用「研究員」杜永彬在清華大學召開的「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共同體」研討會之「西藏問題與中美關係論壇」上，闡述的情況可知一二。他們不想真正面對西藏問題，不想正視西藏境內的現實情況，不會深入研究西藏問題根本原因的基礎上尋求解決西藏問題方法。反而，以達蘭薩拉的「藏獨牌」、西方反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的「西藏牌」等欺上騙下。如，杜永彬說：「隨著美國經濟發展勢頭漸好，內政和外交形勢好轉，在奧巴馬第二任期（2013—2017年），美國國會和政府可能會在對華政策中加重「西藏牌」的籌碼，其西藏政策有可能會從溫和走向務實甚至相對強硬。因此，在「後達賴時期」，達蘭薩拉的「藏獨牌」和西方反華勢力和民族分裂勢力的「西藏牌」遙相呼應的勢頭可能會加劇，「西藏問題」在國外和國內對中國的負面影響有可能加大。」

杜永彬的言論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能直接影響中國高層對西藏問題的處理方式。他的研究重點是「美國的西藏政策」，他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是內部發行，專門提供給中共高層。不面對西藏問題的本質，以「藏獨牌」、西方反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的「西藏牌」等進行誤導，從而會導致中共將更加嚴控西藏，繼續堅持強硬的打壓政策。

2013年7月18日于達蘭薩拉
轉載自《民主中國》

西藏流亡政府发表声明 反驳俞正声

在中國政府對西藏問題進一步表示了強硬態度後，西藏流亡政府發表聲明進行反駁，說中國高官的說法與事實不符。

負責宗教和少數民族事務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周二在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調研時強調要「旗幟鮮明地深入開展對達賴集團鬥爭」。

俞正聲指責十四世達賴長期從事分裂祖國的活動，並說達賴喇嘛提出的『以大藏區高度自治』為目標的『中間道路』，是同中國憲法、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完全對立的。」

西藏流亡政府的信息和國際關係部部長扎西平措說，中國政府在西藏的壓迫政策和西藏的現實同俞正聲所講的完全不符合。

扎西平措說，如果中國政府真想在西藏實現持久穩定，中國領導人就應該改變對西藏的政策，順應西藏人民的意願。他說，政治自由才是關鍵，而不是生計。

他還重申了流亡政府堅定致力於中間道路，並且相信對話是解決西藏問題的唯一途徑。經過民主選舉的流亡政府總理桑蓋博士也強調實質內容重於過程，西藏領導人準備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進行有意義的對話。

此前流亡藏人稱，四川甘孜道孚縣軍警對參加為達賴喇嘛祝壽祈福法事的僧人及民眾開槍，導致至少七人受傷。

自由亞洲電台援引流亡印度的道孚僧人亞瑪次仁稱，道孚尼措寺（又名靈雀寺）僧人和甘丹曲林寺尼姑以及當地藏民在7月6日達賴喇嘛78歲壽辰當天為他舉行祝壽祈福活動。

亞瑪次仁稱，大批軍警在祝壽活動期間抵達現場，要求在場藏人停止祈福活動，解散回家。軍警在他們的要求遭到在場藏人拒絕後向人群發射催淚彈並開槍，至少七人受傷。

國際聲援西藏運動引流亡藏人稱，軍警在沒有事先警告的情況下開槍，除受傷者外，還有至少20名當天參加了祈福活動的藏人被逮捕。

自從中國控制西藏以後，西藏地區的抗議持續不斷。自2009年開始，已經有119名藏人在藏區進行自焚抗議。抗議者要求達賴喇嘛返回西藏以及西藏人獲得自由。（撰寫：蒙克/）來源：BBC

西藏色達縣多名 藏人遭判

【VOT8月6日報導】據介紹，上述被判藏人都是西藏色達縣人，其中作家志巴加，於去年2月15日遭捕，被捕前從事教師工作，出版發行很多著作，其中包括記述2008年西藏抗暴運動的《土鼠血跡》等；現年32歲的桑珠和玉章，於去年6月23日遭捕。

西藏甘孜州色達縣的藏人作家崗吉·志巴加等5名藏人日前被中共非法判決。

現居印度北部達蘭薩拉的西藏快報副編曲尼維色向本台介紹說，（錄音）本月1日，位於西藏甘孜州雅江縣的中共人民法院已指控開展西藏問題活動，以及他們是當地民間組織「反紅小組」的成員為理由，對西藏色達縣5名藏人做出非法判決，其中西藏作家崗吉·志巴加被判5年6個月有期徒刑；桑珠被判5年徒刑；占賽被判3年徒刑；玉章被判2年徒刑；另一位叫西嘉的藏人被判2年有期徒刑。

《翻身亂世：流亡藏人訪談錄》之： 安多果洛藏人 卓洛（二）

採訪者：唐丹鴻 翻譯：桑傑嘉

採訪地點：達蘭薩拉 採訪時間：2010年8月

卓洛：1931年生於西藏安多果洛；1958年跟隨部落逃亡，輾轉五年後到了印度。現居住在印度德拉頓

4. 大哥殺了漢人

那時漢人還沒有干預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行為也沒收到什麼限制。比如來我家的漢人，也只是過來看看，說要買牛羊好馬之類。但我們看不慣他們的所做所為，從心底裏覺得不舒服。比如漢人們把山上的灌木全部砍掉來燒炭。藏人中有些家境不好的人，燃料不夠時也會去砍灌木，但只砍一點點，不會整片整片地砍；而那些解放軍雇用當地窮人去砍灌木，整片整片山坡被砍得光禿禿的，還不分晝夜地燒。那時我已經嫁到夫家了，一出我家帳篷，就會看到黃河邊濃煙滾滾，漢人們在燒灌木做木炭……漢人們還雇用窮人去野地裏撿骨頭、撿牛角什麼的，收集到軍營裏燒。據說是做絲綢用的什麼材料。那些撿骨頭、牛角的人都很高興，因為可以換來大洋。漢人還雇用那些窮人到軍隊營地去屠宰牛羊等等，總之做了一些藏人不做的事，讓人看著不舒服。

這期間，我那被親戚領養的大哥殺了漢人。有一天，我大哥和四個同伴在路上走著，遇到五個帶武器的漢人，但好像不是軍人。我大哥他們把這五個漢人殺了，埋在了荒郊野地裏，然後拿走了他們的槍。大哥他們殺漢人的原因是為了搶漢人手中的槍枝和馬匹，因為當時槍支價格很高。我們對他殺人的事一無所知。直到兩三年後有一天，聽說我大哥被漢人抓了，是因為他們殺了漢人。我大哥是去西寧那邊做生意時被抓的，隨後押送回了達日縣。

我曾經去監獄看過他。探監時他對我說：“你不要擔心我，這是我自作自受。我在監獄裏沒有挨打，吃得也好。”他的臉色還真的不錯。我哥哥的家庭很大，孩子們也長大成人了。他托我帶信給孩子們，讓他們別擔心，在監獄一切都好。那以後就“時事反轉”了，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面。[譯注：“時事反轉”，藏語安多方言“阿皆”，沒有準確的中文對應詞。大意为“亂世”、“動盪”，最初是藏人對“合作化”和“平叛”的統稱，後指“解放”後包括文革等一切災難的集合]

5. 踏上逃亡之路

我24歲那年[譯注：按卓洛出生年推算為1955年，此處可能卓洛記憶有誤]，有一天我聽丈夫說：由於很多地方都發生了“時事反轉”，漢人們馬上召集果洛各部落的頭人去開會。頭人們不得不去呀，以前漢人給的大洋他們都收下了。所有的頭人到齊後，就全部被漢人抓了，一個都沒剩，然後把他們押送到什麼鬼地方去了。

頭人們都被抓的消息傳來後，部落裏男人們說：“錢還積蓄

來幹嘛呢？沒用了，頭人都被抓了！現在我們得買槍和馬，準備逃亡。”我們很清楚無法抵抗漢人，最多能抵抗一兩天，漢人是殺不完的。就這樣，在果洛合作化開始之前，我們部落的人就已經買好了槍和馬，一切準備就緒。

一年後，不知道是誰領的頭，我們部落的部落兵在離村子不遠的山上，跟解放軍打了一仗。只打了幾個小時，兩三個部落兵被打死了之後，我們就被打垮了，大多數人投降了。要是果洛的頭人們沒有被抓的話，果洛各部聯合起來，說不定還能堅持抵抗幾天的。雖然我們會死人，但漢人他們也會死人，我們至少還能多抵擋幾天。勢單力薄，我們部落只打了一仗，不到一天就被打垮了。

部落兵被打垮之後，我們部落開始了逃亡。我和丈夫紮洛、我婆婆、我女兒、丈夫的兩個僧人兄弟董薩喇嘛和多貢仁布切，丈夫的哥哥一家、還有他們的親戚曲尼和薩奧，我們都在一起。我女兒當時還不會走路。當天我們在山上躲藏到天黑。我們想要逃到一個叫瓦納的地方，那裏是崇山峻嶺，有大片的森林。更主要的是，聽說瓦納地區還沒有被漢人佔領，所以我們想逃到那裏去。

6. 我娘家人沒能逃脫

我家有很多牛羊牲畜，逃走那天，我們把能趕走的趕著一起走，趕不走的就丟棄了。我們趕著牛羊，逃到了瓦納對岸的河邊。天下著大雨，河水猛漲我們無法渡河。果洛其他部落的很多人也逃到了這裏，一起擠在河邊。就在這時，瓦納的民眾從對岸向我們喊話：瓦納已經失守了！而同時，這邊果洛逃難的人群中也有人在喊：漢人追上來啦！大家立刻慌了，開始涉水過河。人們先讓馬下到河裏，然後抓著馬尾巴過河。我丈夫和他的兄弟先把我婆婆送到了河對岸，然後回來接我和女兒，丈夫扶著我，他兄弟背著我的女兒，我們總算渡過了這條河。幸運的是漢人沒有繼續追趕我們。

過河時我們不得不把牛羊丟棄在瓦納對岸了。過了河之後，只好在瓦納再買牛羊等維持生活。幾天後河水退去，我們又返回瓦納對岸去尋找自家的牛羊，只找到了一些馱牛。

到瓦納後兩三天，我娘家全家人也逃來了這裏，母親也在。瓦納地方小，逃難人群各自分散自顧紮營。當晚我與娘家人匆匆見了一面。第二天，解放軍又來追擊我們，把我們給打散了。我們跑掉了，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母親和其他親人的面。

在後來的逃亡中，我沒有絲毫娘家人的消息。直到80年代，我返回家鄉探親時，才得知在瓦納，我娘家人沒能逃脫，我家族的人在瓦納被漢人殺的殺了，抓的抓了，餘下的人也被趕回

去合作化了。我叔叔、哥哥、姐姐們都被抓了，家產全部被沒收了。有兩個姐姐在批鬥時被打死了。我返家探親時，看見我的一個姐姐，手已經殘廢了，是遭批鬥時被捆綁弄殘的。

7. 就像屠宰場門口的牛羊

我們跑到了瓦納上部。逃亡到瓦納上部的果洛人也很多，在這裏有些人不想再逃亡了，他們說：“別再逃了，到處都是漢人，沒有可逃的地方了，還是回家鄉去吧，讓漢人合作化吧。”有人說：“回去是死，繼續逃亡也許會死，所以不管怎樣要繼續跑，管它能否逃得出去。”這樣，有部分人回去了。但我們仍然相信，在所有的彈藥打完之前，能逃出去的。我們八十多人選擇了繼續逃亡。

然後，我們就趕著牛羊繼續往北方的羌塘方向走。路上連看到一隻烏鴉都會警惕，懷疑是不是漢人。有一天我們正在趕路時，突然聽到了“鐵鳥”飛機的聲音。以前在家鄉時我就見過漢人的飛機，有一種飛機頭部是紅色的，還有一種頭部不是紅色。沒過多久飛機就飛到了我們的上空，飛得那麼低，我們能看到飛機尾巴上有漢人持槍站著。當時女兒在我懷中，我已經沒有了怕的感覺。我們跑了這麼遠，漢人一路圍剿追殺，我們就像站在屠宰場門口的牛羊，隨時都可能被人宰殺。

飛機沒有扔炸彈，只是開槍。它在我們上空轉圈，把飛機的尾巴對準了我們時才開槍。這時人們已經四散跑開了，牛羊就更難被打到，子彈大多打在了空地上，沒有殺死殺傷我們太多的人。這時我們部落的男人爬上了小山，也開槍打飛機，好像子彈打中了飛機，飛機一下子飛高，離開了。從這以後就再沒有飛機來打我們了。

8. 有人說跳崖自殺

飛機打擊我們的時候，牛羊受驚掉頭往回逃，加之地面也有解放軍追趕，我們在拼命逃跑中丟棄了牛羊。沒過兩天漢人又追了上來，我們不得不拋棄更多東西以及所有的食物才得以逃脫。接下來我們不僅斷了糧，連水都沒有了。跑了七天，一路上沒有遇到一個人，眼睛漸漸地看不清楚前面的東西了。

天氣非常寒冷，加上斷糧多日，我女兒沒有奶吃，沒有水喝，昏迷過去了，一直不能開口說話。我抱著她想：孩子啊，你死在父母之前，死在父母懷中，特別是在爸爸被打死之前先死了也好，總比死在父母之後強啊。

我們來到了一片沒有大山的曠闊的荒野沙地。這個地方根本沒有水，好多人口渴難耐，小孩們快渴死了。有一天我們走到了一塊長有棘刺的地方，棘刺上長有紅色的小果實。人和馬看到後，全都沖進了棘刺叢中，狂吃小果實。我們採集了小果實，把果汁滴入小孩口中，這對小孩有一點點幫助。

再繼續走了一程後，大家餓得實在走不動了。於是有人說：要麼我們走到懸崖上去，先讓女人和小孩跳下懸崖，然後所有的男人再跳下去。與其落入漢人手中還不如這樣全體自殺。大家都表示同意。女人們大聲嚎哭，悲痛萬分。我們知道，要是丈夫們不管我們的話，本可以輕易逃走的。悲痛籠罩了所有的人。我也沒有多想，那麼多女人都能決定跳崖，我也沒有什麼決定不下的。再說這樣也好，我們已經跑了這麼長時間了，這逃亡是沒有邊際的……

我們中有一個老人騎了一頭犛牛。這時，我丈夫建議：先把老頭的犛牛殺了吃，大家輪換把自己的馬給老人騎。沒有馬就無法逃跑，所以我們不能宰馬。先吃犛牛肉然後再想辦法。大家同意了。隨後我們宰了這頭犛牛，根本等不及煮，大家分吃生肉。一頭犛牛的肉分給八十多人，每人只分得一點點。除了骨

頭以外，大家把犛牛全身都給吃光了，沒有浪費一滴血。生犛牛肉很難嚼碎，老人們沒有牙，吃生肉時非常困難。

我把犛牛血滴到昏迷過去的女兒嘴中，女兒慢慢地睜開了眼睛，喝了一點犛牛血之後，能開口說一點點話了。分到的那塊犛牛肉我和丈夫捨不得吃，就把犛牛肉嚼碎後喂給她，這樣我女兒才慢慢地好起來……

9. 遭遇內蒙古騎兵

我們繼續趕路，來到一座小山腳下時，看到了很多被棄的牲畜和廚具等。看上去像是逃亡者遭到了漢人襲擊，扔下這些東西跑了。我們宰殺了這些牲畜，帶上肉作食物。走了不久後，我們遇到了一個叫雅拉的部落，得知從這裏可以去拉薩。後來路上又遇到一個人，告訴我們拉薩已經淪陷了。我們又開始折返回北方跑。

往北跑了很久，有一天，我們看到一些遺留的爐灶。那是之前的牧民在此紮營，搬遷後留下的痕跡。我們中間有人認出，這種灶的樣式是蒙古人的。蒙古牧民的灶與藏人的不一樣。他們燒羊糞，藏人燒牛糞，而且那些灶的旁邊挖了一些小坑，那是釀酒用的。看來我們已經到了蒙古人的地盤了。我們繼續走了幾天，發現前面有蒙古人。我們派人前去打探，看到在很多蒙古牧民的蒙古包之間，夾雜著解放軍的帳篷。我們不敢再往前，就偷了一些蒙古人的馬掉頭往回走。沒過幾天，蒙古人和解放軍追了上來，我們與他們打了整整一天。我們這邊沒有死人，可有幾匹馬被打死了。打到近晚，他們撤走了。

還有一次在阿讓納格（譯注：地名），我們被十多個解放軍發現了。這些解放軍是蒙古人，蒙古軍人穿的是蒙古服。蒙古解放軍比漢人解放軍兇猛很多，他們追了上來。我丈夫和另外兩個人一塊兒前去阻擋，一直打到下午。那兩個同伴，有一個的大拇指被打掉了，另一個被打死了。那個大拇指被打掉的人對我丈夫說：“我們把皮襖脫了吧，上去跟他們肉搏！”就在這時，頭領趕到了。頭領說：“如果你們要肉搏的話，那就讓我先沖上去吧。”我丈夫和另一個人趕緊說：“別，別，那我們都別去了吧。”然後他倆趕緊穿上皮襖，重新拾起槍跟頭領一起打。最後撤離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的兩匹馬被打死了，只剩下我丈夫的那匹馬了。我丈夫讓那個手指被打掉的同伴騎馬跑，頭領和我丈夫則一邊打，一邊撒腿跑了回來。

我們躲在山上，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切。後來那些蒙古軍在沙丘上插了幾面紅旗，十幾個人便排隊回頭走了。這時又看到遠遠的，一大隊解放軍迎著那十幾個蒙古人的小隊走來，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匯合後並沒有往我們這邊追，而是返回了。我們覺得又慶倖又奇怪。

當天晚上我們跑了一整夜，往大山上跑。在那座大山上，我們看見了死掉的“念”的屍骨和角，滿山遍野都是，擋住了我們的路，走過去很難（譯注：“念”即盤羊）。這些“念”太可憐了，大概是遭雪災死的。這幾天我們一直空著肚子，有幾個同伴在“念”的屍骨附近，找到了一個還帶著皮肉的屍體，大家就把它分著生吃了。

第二天，在一座叫朵志的大山腳下，我們看到了一群牛羊，看來是別的逃難者沒能趕著一起走的。我們就宰殺這些牛羊吃。吃了這些牛羊肉後，我們體力都恢復了不少。造孽啊殺了這麼多生！

10. 逼上大雪山頂

有一天，我們在一個地方停下來，派人去探尋前面的路。結果發現前面根本沒有路，只有雪山。我們決定當晚就地過夜，

第二天再回頭走。在這兒我們還碰到了另一個在此紮營的部落索日瑪。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還在睡夢中，忽然遭了解放軍大炮、機槍的攻擊。頭一天山上霧氣很大，我猜解放軍其實早已發現了我們，一直用望遠鏡盯著我們的行蹤，待第二天天剛亮便開始追剿我們。索日瑪部落一路上還不曾遇到過漢人，所以他們的武器彈藥尚很充足。而我們部落之前已經與解放軍交手過，彈藥所剩無多，只好逃跑。那天我們部落同伴們的營地在半山腰，他們五六十人都安全地逃走了。而我家的帳篷紮在營地邊緣，靠索日瑪部落很近，所以我們被打得很慘。

我們沒有退路，只能往山頂雪峰方向跑。我鞋都沒有來得及穿，好多人都是光著腳跑的。跑到山頂時，光著的雙腳都凍傷了。牲畜也在山上亂跑，蹬下石頭砸傷了我的大腿。大山頂上是冰川，無路可走。我看到我丈夫懷裏抱著我女兒，背上背著他媽媽，向一道小山溝走去。我跟著丈夫的方向走了幾步，就失去了知覺。

醒來時，發現丈夫已經把我背到山壁的一個凹處了。丈夫返回去找尋其他家人，忽然看見雪地上露出一隻手，他拽起手拖出來一看，是他哥哥的老丈人，這老頭當時差點死了。丈夫又把他背到我旁邊，老頭不停地說：“感謝你！感謝你！”。然後我丈夫又回頭去找他的兩個喇嘛兄弟。董薩喇嘛的腳凍傷了，腫得無法穿鞋子；多貢仁布切中了槍，兄弟倆牽著馬走不動。接回僧人兄弟後，我丈夫又去把他母親背到我們藏身的地方。

周圍是懸崖峭壁，我們家多貢仁布切中了槍，董薩喇嘛的腳凍傷了，我的腿被石頭砸傷，腳也凍傷了。我們沒有任何食物，也沒有水喝，到了晚上我們口渴得好像血都快幹了。我丈夫說他得去尋找水。他摸黑爬了很久，月光下遠遠地看到有一處亮光，爬過去後見是一塊冰。他拿石頭砸了冰用藏袍裹了回來。我們口渴得要命，都瘋狂地吃冰塊，後來才發現舌頭被冰塊割破了好幾處。我婆婆沒有牙齒，我丈夫就先把冰塊放到自己嘴裏融化了之後用嘴直接往婆婆嘴裏灌。我女兒已經昏迷了，我丈夫的兩個喇嘛兄弟就往她嘴裏灌水。

這時候，我丈夫的哥哥說：“我們快走，不走的話漢人會追來的！”我丈夫說：“老老少少全受傷了，怎麼走？漢人來也沒辦法。”他哥哥又說：“你們不走我要走，需要留下我老婆幫忙麼？”我們非常生氣，就說：“你們走吧，想走就走吧，把你老婆也給帶走。”他和他老婆還有他們十二歲的兒子就一起追部落其他同伴去了。

11. 索日瑪部落被殺得一個不剩

第二天天亮後，我丈夫把我們一個一個的背到一個山洞裏，然後對我們說：“我們要麼死在漢人手中，要麼會餓死，總之都是死。所以，你們不要擔心我，我要去昨天早上遭襲擊的地方，找些食物回來。”我們想要阻攔他，他說：“你們別擔心，我自己多加警惕，不會有事的。”說完就走了。我們可以遠遠的望見他翻過了山口，那個山口高的令人無法相信。

他爬上山口觀察到解放軍已經撤離了。索日瑪部落的這一群難民大概有三十來戶，男女老少約一百人。昨天解放軍用大炮、機槍轟炸和掃射，把索日瑪部落的這些人殺得一個不剩，屍體遍地。索日瑪部落紮營的地方濃煙滾滾，漢人把索日瑪部落的食物、衣物和一些屍體堆在一起點火燒了。

他繼續搜尋，看見地上有一口皮口袋，旁邊還有一隻犛牛毛編織的口袋。他打開一看，皮口袋裏面是幹羊肉，編織口袋裏是火鏟和其他用具。我們自己的火鏟在逃跑中丟失了，沒有火鏟我們就沒法燒火。這個火鏟簡直像是三寶特意送給我們的一樣，因為一般來說，火鏟絕對不會裝在編織口袋裏的。

我丈夫背上這兩隻口袋，在路上他又撿到了另外一皮袋幹羊肉，但他背不了那麼多，只好背了兩袋半回來。那些幹羊肉非常好。他把羊肉切碎放到鍋裏煮，然後給我們喝湯。那對於我們來說是一頓美餐，但因為我的舌頭被冰塊割破了，無法吃食物，只好由我丈夫嚼碎後喂我。休息了一天后，其他人都恢復得很好，可以走路了，而我還不行，因為我大腿上被石頭砸出的傷口發炎腫脹了。

我丈夫建議追趕部落同伴們，董薩喇嘛說：“我們追不上他們了，他們人強馬壯不像我們。”最後，我們決定先就近找個地方住下再看。他們把我綁在馬上，向山下慢慢移動。走著走著遠遠的傳來呼喊聲，漸漸的聲音離我們越來越近，原來是離我們而去的我丈夫的哥哥，他回來了。兄弟幾個又是相互擁抱，又是抹流淚。

回來的哥哥說：“我們那夥人跑了一天，弄不到食物。部落的人也在往回走，想回頭去找丟棄的食物。明天大家就會到這裏的。”沒多久，其他同伴們也回來了。他們中有老人有小孩，我們想先給小孩和老人煮些肉，誰知火鏟怎麼也打不著火，他們只好吃生肉了。

12. 頭領丟下我們走了

我丈夫的哥哥返回遭解放軍襲擊的地方，找到了兩代布朗槍的子彈，是解放軍沒有發現的子彈。背著子彈回來的時候他滿頭大汗，說子彈重得要命。

找到子彈後又起了一次小風波。因為部落其他人要我們把子彈分給所有人，但我丈夫的哥哥認為，這是他自己找到的，為什麼要分給大家？經過很長時間的爭執，他最終同意了分給大家。可我們的頭領說：“按戶分子彈。”我丈夫的哥哥非常生氣，他說：“只能按槍分子彈，按戶分沒有任何道理。若要按戶分，我一顆子彈也不給你們。”最後，還是按槍支分了子彈。哈哈，我們就是這樣內部爭吵的，丟臉呀！

就地休息了兩天以後，我們翻過了兩座大山。眼前是茫茫草地，草有一人高。我們在那裏停留了三天。第三天晚上，頭領對我丈夫說：“你不能只顧著照看一個生病的老婆和老媽，犧牲部落的兄弟們。給你老婆和老母安排一個睡覺的地方，留一些食物放在旁邊，我們走。”我丈夫說：“我背井離鄉，這些年來出生入死，就是為了不讓她們遭受子離夫散的痛苦，並不是我怕死而逃亡的。我們兄弟已經把子彈分給你們了，你們可以殺野驢生活。你要丟棄你的家眷隨你的便，我絕對不會丟棄我母親和老婆自己逃走！”頭領說：“那你們隨後來，我們在前頭等你們。”我丈夫說：“你們能走多遠就走多遠吧，不必等我們。”從這天起，頭領帶著部落其他人，丟下我們走了。

我們一家人在荒野中慢慢前行。我腿部浮腫後腐爛，不能挪步。騎在馬上，馬肚子會被膿水濕透。我們也沒有藥之類的東西，傷口只能用一些破布片綁著。不久，我婆婆去世了。她臨終之前，我們都在哭泣，她對我丈夫說：“兒子你不要難過。你一定要把妻子和孩子帶好，千萬不能丟棄。你妻子離開自己的母親家人跟隨了你，你不能離開她，這是媽媽對你的要求。”我婆婆不是一般的佛教徒，她藏文水準很高，佛教經典學習得很精通。她還對我們家的兩個喇嘛說：“我快要斷氣了，你們倆給我念一下無量光佛的咒語吧。”董薩喇嘛回答說：“您是我們的母親，我們會為您念的。”婆婆說：“要為所有眾生念。”

----待續



藏人慶典達賴喇嘛78華誕，遭中共軍警槍擊



藏人保護環境遭中共軍警鎮壓